

提一点建议 讲一点理论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于 光 远

目 录

目 录

对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1
在决心改革之后	24
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32
谈谈小经济	43
放宽经济政策是前进不是倒退	47
能不能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体系?	53
制定计划的四种方法的统一	71
计划管理与计划管理机构	89
建立和发展国土经济学研究工作.....	104
人力资源及其利用.....	126
关于建立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134
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	142
编后记	154

体制改革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新事物，马恩列斯都没有讲过这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要依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问题。今天，我们既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现成的、已经成熟的科学。也不能说我们今天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对于指导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够用了。

大家知道，不论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方面或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各国学者都在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方面，我国学者正在研究的问题而且有的已经有初步结论的，就有：

(1)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范围是否应该把国营企业之间互相交换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在内？承认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意义是什么？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是否都是必要的？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否看作一个大工厂的生产一样，做到由一个社会中心来集中指挥整个社会的生产，由一个中心来要求各企业严格地、准确地按照这个计划来活动，由一个中心来分配一切资金、劳力和物质资源？

(3)如何正确理解在经济工作中国家合理的作用？国家的权限和企业的权限应该如何正确划分？在无产阶级革命胜

利后建立起来的国有制经济是应该继续发展和加强呢，还是要考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过渡到更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4)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有哪些调节生产和消费的手段？这些手段如何按照它们的性质进行分类？(现在匈牙利把调节手段分为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两类，在经济手段中又分为直接的经济手段，如税收、补贴，与间接的经济手段，如通过市场物价机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纯收入、工资、奖金、集体福利基金、生产基金、利息、税收与补贴等经济范畴如何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价格、信贷、工资、福利、税收与补贴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作为经济手段在调节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怎样？如何正确地运用这些经济手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哪些调节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它的作用越来越大，哪些手段会越来越地应用，它的作用越来越小？

(5)为什么要重视由一个社会中心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性？怎样根本保证计划的正确性？采取和不采取直接下达计划的办法，哪一种能够更好地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更好的计划性？

(6)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性质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如何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承认和运用市场原则对计划经济的有利与不利影响，如何正确地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其对计划经济的有利作用，避免其不利作用？

(7)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如何正确处理各个不同的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使这种差别既能够

反映劳动多少和工作好坏，又使广大劳动者认为这样的差别不过分；如何使这样的差别最有利于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在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和企业与企业之间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些是所有国家在实现经济改革中都要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方面重要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今天也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发展。上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一些当时可以作出的描绘。本世纪初，列宁也只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后的历史事实，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和在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并且根据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新情况，对未来社会有了比马克思、恩格斯更为具体更为现实的了解。现在时代前进了，又有许多新问题要求作出科学的回答，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又进一步获得很大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越来越尖锐，革命时机何时到来也看不清楚。当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如何根据新的历史资料再一次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必须很好完成的工作。至于已经取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将如何进

一步发展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不少，也写出了不少书和文章，但也不能说已经讲清楚了，已经有了现成的东西，应该说还差得很远。

举例来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再存在商品，因而也就不再有价值，但是还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我认为根据十月革命以来六十多年的经验，这样来规定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特征，未必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很可能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是同时存在同时消亡的。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修正一下马克思的论述，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仍然保留着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这个范畴仍然存在，价值规律仍然发生作用，或者说是否可以修正一下列宁的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加按劳分配这个公式，把它改为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加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个阶段，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旧是一方面存在着全社会共同利益，彼此间进行着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社会各个成员和社会的各个经济组织甚至管理机关本身的物质利益，他们在经济往来中计较彼此的利害得失，因此即使社会发展到了那样的阶段，不但按劳分配不会消亡，就是商品生产也不会消亡。我认为这样来看问题可能更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又可以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期存在商品生产有更深一层、更为彻底的认识。

再举一个例子。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个时期内建立起来的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它们存在的根据、对它们的社

会主义成熟程度或水平、以及对它们的发展前途的估计究竟如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问题。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有制是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前途则是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过渡，而且把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至于象农村自留地经济和家庭副业等社会主义辅助经济，则被看成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们的存在是权宜之计，是很快就要抛弃的。道理究竟应该怎么说，能不能认为这三种经济的存在都表示社会主义还处在比较低的阶段，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都将向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总之，对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要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科学社会主义中许多问题的答案，都不是现成的东西。它们是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作出艰苦努力才能取得的科学论断，而这样的论断就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一部分。

我认为，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解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决不是简单地把现成的东西运用到我国的实际问题上来，而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作为这个理论基础的 political 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中的这些部分，只有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总结六十多年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方面所获得的科学成果。今天应该说可供进行这种总结的材料的积累是大量的。例如，如果说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还看不清楚的话，到今天世界各国又提供了多少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学者们又写了多少书文，所以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认真研究，在主要的理论问题上作出科学的结论，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关键在于我们重视这种理论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要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来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在研究本国的实际上下功夫。认真批判现行经济体制，分析、研究在本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各方面的条件。不把在实行改革前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问题，不把这一套的弊害揭示出来进行分析、批判，就不可能对症下药，提出正确的改革方案，也不能激发起人们实行体制改革的热情。匈牙利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就公开出版了两本经济学家（其中一本是当时的中央统计局局长写的）批判匈牙利经济体制的书籍，引起人们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对匈中央下决心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而一九六四年，在匈党中央委托研究和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小组组成之后，他们又先拿出一年半时间对当时实行着的经济体制进行批判。一面批判，一面就逐渐形成改革的设想。我认为匈牙利这样来准备改革方案的做法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所谓批判，无非把某一事物作为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就是依据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的原则，弄清楚现行体制对发

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着哪些好的作用，起着哪些坏的作用，弄清楚现行经济体制中有哪些东西是正确的东西，有哪些东西是错误的东西，有哪些当时是正确的，而现在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变成不利的东西。批判决不是否定一切。同时，改革也不等于抛弃一切，而是要作科学分析，应该保留的就坚决保留，而应该抛弃的也要坚决抛弃。但是究竟应该保留什么，抛弃什么，结论不能在进行分析批判之前，而应该在分析批判之后。匈牙利这一年半的批判，对他们能够顺利地制定改革方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他们以后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这个改革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这个经验值得重视。

我还认为，在我国进行一个时期对现行经济体制的批判，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我国的经济情况。我们生活在中国，但是不能说我们已经很好地了解了本国的经济情况。现在，对我国经济现状，对我国经济体制，对我国经济工作评价不一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我国经济情况没有一个经过核对的全面的资料。我主张编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本经济白皮书，就是希望各部门、各地区把三十年来的情况来一次总的清理，向党中央、向负责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提供关于我国经济实力，发展我国经济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劳力资源），存在着的问题，以及运用我国经济实力和有利的条件，解决存在着的问题的手段等一个全面的资料。我国是有近十亿人口的大国，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工作中问题很多，困难成山。各部门、各地区的情况又有很多差别。因此即使大家看法比较

一致，不花很大力量去调查研究，也很难对我国的经济情况作出一个细致的、系统的、科学的分析和描绘。并且现在我们说要弄清楚我国的经济情况，也不是指零零碎碎地掌握到大量的材料，而是要掌握能够说明各个重要问题的必要的可靠的材料。当务之急是围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去作调查研究。实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用一段时间去进行批判现行经济体系，就会使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展起来，并且在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批判中，最容易看出什么材料最重要，最能说明问题，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能够摆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实，一起来进行核对工作。

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弊病很大，必须进行改革，这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党和政府也已经作出决定必须实行改革。但是对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究竟在那里，作出最后的结论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经过仔细研究、多方面的考虑斟酌是不行的。至于如何改革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进行这项改革一方面要弄清楚改革的理论原则，同时又必须根据我国的各种条件，包括地理、人口等条件，包括几千年历史造成的经济、文化条件，也包括建国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形成的条件，才能定出适合我国国情能够见之实施的改革方案。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体制的原则可以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总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很不相同的。比如匈牙利是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只相当我们山东省下面的一个烟台地区。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煤矿，一个钢铁厂，解决他们国家的经济体

制改革问题的条件和解决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条件是有很大区别的。

确定如何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要考虑我国各方面的客观条件。除客观条件外，当然还有主观的条件，即人们的认识、意志决心怎样，理论和文化水平怎样。客观条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不管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它都是已经存在在那里的东西。有的甚至是根本改变不了的东西，如我们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有的是长期改变不了的东西，我们的一切主观行动都要考虑到这些客观条件，我们的体制改革也必须考虑到它们。所谓考虑到这些条件，就是承认这些事实，因而在我们建立的体制中必然要带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至于主观条件，如人们对实行经济改革的认识是可以通过讨论，通过说服教育，使它比较快地发生变化的。我们在确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时，当然不得不照顾到人们的主观条件，但它不能成为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方向的依据。

研究外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在还落在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后面；这对我们是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有外国的经验可以参考。

南斯拉夫是摆脱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最早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在与情报局决裂，被迫采取的行动。它是独立地闯出这样一条路的，它遇到的困难最大。当时没有外国的经验可供参考。外国学者们在一九五二年时也没有人写这方面的著作。而在匈牙利酝酿经济体制改革时情况就很不相同了。当

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已经不是一国的现象。不但南斯拉夫早在一九五二年就提出要实行工人自治，东欧好几个国家都想摆脱从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搬过来的模式。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就走在匈牙利的前面酝酿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匈牙利在研究本国的体制改革时就有可能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是很认真、很积极的。他们不但仔细研究过外国经济学家关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著作，而且派人到南斯拉夫、捷克等国研究这些国家实行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受了南斯拉夫比较大的影响，从南斯拉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捷克经济改革家、布拉格之春时的前捷克的副总理奥塔·锡克的思想也给他们以启发；对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著作和其他有关著作，他们也作过认真的研究。他们承认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就比南斯拉夫方便得多。我们比匈牙利更加有利。

近年来在研究我国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对外国经验也是很重视的。根据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好几个部，好几个高等学校以及外交部、新华社所属机构，就外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提供了不少材料。我们还出国进行了考察。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材料中，可以得出外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概念。可以看得很清楚，研究外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但可以了解外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还可以了解外国许多具体的做法。对外国的情况了解得越具体，知道外国是什么条件下采取这种或那种方针，就越可以根据本国与外国条件的异同来考虑在本国实行体制改革的原则与方法。

当然我们的了解还比较少，认识也不深，因此我认为在国内的机关、学校以及驻外使馆和记者对外国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懂得有关国家文字的干部，应该动员他们当中适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做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还要做好搜集这些国家的经济书刊和翻译介绍过来的资料的出版工作。并通过研究会等形式组织有志于研究外国经济问题而不懂这些国家文字的人去研究已经翻译介绍过来的材料。这样对外国经济体制的研究工作就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就。现在，一方面许多重要的外文材料没有介绍过来，一方面又缺少人去研究已经翻译介绍过来的材料，因而本来已经可以弄清楚的事，仍旧在不少人头脑中没有弄清楚。对外国的情况时常有一些误解，重复劳动也很多，出国考察的人也由于没有研究国内已有的材料，到国外继续去问人家不知道已经回答过多少次的问题。这样做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研究外国主要靠经常性的工作，有计划地、有目的地出国考察，当然也是必要的。只要准备得比较充分，应该在出国前事先对已有材料进行研究，对考察的目的更加明确，出国后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考察，总是可以了解到不少书刊上看不到的情况。耳闻与看书面材料与亲身到现场和外国人直接接触作调查终究是有区别的两回事情，可以使我们的知识增进不少，不虚此行。我还觉得如果同时多研究几个国家，进行比较的研究就更加容易把问题弄清楚。不但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好的国家要研究，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搞得不好，经济情况发展的不那么好的国家也应该去研究。只有对许多国家的情况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我们的思路才

能更加开阔。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强调这种比较研究的时候，还不知道外国早已经很重视这种研究。现在我知道，不论西欧、东欧、日本、美洲，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中都在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工作。在我们的研究机构、研究团体和学校中也应该制订比较经济研究的计划，组织力量开始这项工作。而且我还认为这种比较经济的研究，不但要比较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应该比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国家的有些作法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借鉴的。不但在微观经济管理方面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抱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态度，就是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影响。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搞计划经济方面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创造投入产出法是在苏联学习过、在苏联计划委员会工作过的列昂节夫，这并不是偶然的。此外，比较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出一些研究题目。例如奥地利与匈牙利、捷克在奥匈帝国时代同属一个国家，把匈、捷与奥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许多问题。可是这样的工作现在也还没有开始做。

本文一开始，我就说明本文不想对我国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新的经济体制发表意见，对这个问题作者以后有机会再写。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考虑制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应该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方案呢，还是局部改革的方案，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改革方案观，还是只带有临时性质、暂时性质的改革方案；是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改革方案呢，还是只提出一些具体改革的办法，改变一些

组织上关系，改动一些组织机构的形式的方案；是在理论上彻底的，有一贯的逻辑性的方案呢，还只是改良的、妥协的方案。我想就这一个问题再说一点想法。

前面我说过，匈牙利的情况同南斯拉夫不同。南斯拉夫在一九五二年实行工人自治，是在同斯大林和情报局决裂后采取的果断措施，事先没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去周密考虑，设计他们的经济体制；而是先决定了一个自治的根本原则，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然后一步一步地解决新的经济体制所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困难很多，走过的道路比较曲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使他们的经济体制完善起来的。匈牙利则是在比较稳定的局面下，经过比较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其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先是制定其改革的原则、办法和实施步骤，然后付诸实施。我国现在的情况与匈比较接近，可以采取，也应该采取作好充分准备，然后再进行改革的方针。

匈牙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党中央决议中确定的新经济体制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改革。它的目的是建立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实行的制度。决议中规定的新经济体制是在原则上不同于以前体制的新体制。他们注意到要使这个改革有一个明确的比较彻底的理论来指导（我们只说是比较彻底的，这是因为还有不那么彻底的地方）。

我认为，我国的这次经济体制改革也应该是象匈牙利那样，是由明确的、比较彻底的理论来指导而确定的改革，是带根本性的、长期实行的、具有原则意义的改革；而不应该只是一种带临时性质的，只是为了应付遇到的部分问题而确

定的改革。

为什么说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明确的彻底的理论指导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不至于带盲目性，才能够把为什么要实行经济改革，为什么实行的要是这样的经济改革，而不是不改革或实行的是另外的改革，说出一个驳不倒的道理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定下来的经济改革的方向、方针不容易发生动摇。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发生了什么问题，也只会具体的问题上作些变动，不会在根本的问题上发生动摇，因而能够保持经济改革的稳定性，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十二年，虽然中间发生过一些波折，但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却坚持了下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制定这个决议前经过一番争论，在理论上最后解决了不少问题。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广大干部和群众去做的。他们的行动不能是盲目的。他们对体制改革的自觉性是改革能够实现的一个必要的因素。因此就必须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中主要的内容就应该是理论教育。不在理论上作比较充分和彻底的研究，还能用什么东西去教育干部和群众呢？一九六六年五月匈党中央作出决议后，就办过大规模的训练班来教育所有主要企业的经理负责人员，接着又对比较次要的企业的负责人员开办训练班进行教育。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经常进行这样的教育。

当然实现体制改革不是写文章，它是要见之行动，要全党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去执行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时，不作任何必要的妥协是办不到的。匈牙利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险性。为了长远的利益，我们要在带根本性的体制改革的准备工作上下更大的功夫。这样就要求我们下更大的决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做好这项准备工作。

在决心改革之后

提 要

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下了决心之后，我们要解决：（一）明确改革方向；（二）对新体制进行全面的设计；（三）解决好实施改革的步骤这样三个层次问题。而步骤是和条件结合，对这三个层次的问题，现在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理论上要深入探讨，在设计上要全面细致，特别在确定实施步骤上必须研究采取某一类改革措施所必需的条件。这类条件或者是经济形势，或者是组织工作的水平；可以是改革以外的条件，也可以是与准备采取的措施相配套的其他措施。由于我国情况复杂，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必须对经济体制实行改革，这是从我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个改革，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心很大，我国经济学界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有改革的要求。当然缺乏认识的人总是有的。因此还有进一步阐述这个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加强宣传的必

要性。对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里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在决心改革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应该解决好，那就是：（一）明确改革的方向；（二）对新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设计；（三）制定实施改革的步骤。

关于明确改革的方向。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进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应该考虑的问题差不多都提出来了。这些问题是：

（一）应该确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和在我国社会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合理的结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在一个国家里的具体化。

（二）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在现阶段还不应该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有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允许其存在，有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主要是指非社会主义的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居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其存在和适当的发展。对各种不同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采取不同政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身范围之内的问题，然而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

（三）国家的经济作用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时所采取的手段。国家的经济作用，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范围，在这里指的只是它在对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国家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采取的手段的问题，包括：应该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还是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应该采取哪些经济手段，如何运用这些经济手段？在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时，行政

的、法律的手段的意义和作用又如何？经济手段和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

（四）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商品性和市场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作用。在这里，包括的问题有：生产资料是否应该商品化，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范围和程度应该如何，社会主义市场的性质和特点等，是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

（五）企业、地方管理机关和中央管理机关的分权。目前的提法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地区的、行业的限制，按照经济的原则实行联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提法只适合于企业自主权过小时的情况，它不能成为长期的方针，因为总有一天企业自主权比较充分，不应继续扩大。企业、地方、中央分权问题的提法与打破地区、行业界限实行联合的提法则是长期的。

（六）劳动者在经济组织中的主人翁的地位。从劳动者对管理的参与到劳动者在经济组织中比较充分地当家做主，是一个发展过程，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在经济组织中劳动者当家作主，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要研究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条件。经济组织中应该建立一些怎样的制度，来支持、推进、实行劳动者对管理的参与到劳动者的自行管理的逐步前进创造条件。

（七）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各种形式。包括基层的经济组织、联合的经济组织、以及行业的经济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组织等的形式、地位和作用。

（八）各种社会组织——如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

用。这些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应采取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

可能还有一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没有提出来，但不会多了。

我认为仅仅是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的成绩。它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拓了道路。

在改革方向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从理论上探讨得还不深，没有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并且注意力偏重于其中几个问题，对其他问题讨论得很少。如果我这个估量不错的话，那么对这一层次，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这种研究，对于明确和坚定改革的方向，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说服对改革还有某些怀疑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新经济体制的设计。有了关于新经济体制的蓝图，我们对经济改革方向的认识就具体化了。在这里，我们有意把工程设计的观念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来，为的是使人们了解在实行改革之前，人们不但要解决方向和原则，而且要解决许多比较细节的问题，做到这个新经济体制是确实可行的，做到实行新经济体制后所发生的矛盾，基本上是预先估计到了的，并且是预先已经准备好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做到这种新经济体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我们知道，社会经济生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本来就是一个环节和另一个环节扣紧在一起的。其中直接生产过程又是许多部门在品种上、数量上、定向上、时间上紧密联结、紧密衔接的再生产的过程。同时，整个社会主义经

济组织，又是许多基层经济组织、许多部门和地区的管理机构，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组织的总和。所以我们要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是成龙配套的。必须有一个总体设计，这个新经济体制才是可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单项的改革完全不能进行，但是单项的改革必须是整个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必须有其他的改革与之配套，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否则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关于这一层次，现在我们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呢？看来还只是就单项改革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设计，对于整个体制改革还只处在调查研究和进行试验取得设计根据的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进行总体设计。当然这种总体设计借用工程设计的语言还不可能达到“工作图设计”的阶段，而只能达到“方案设计”的阶段。而且在进行这种“方案设计”前，经济工作也还没有完成，除收集资料外还得进行构思、画草图等等。对新经济体制进行设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几个人在办公室里可以做到的事，不能对这个工作提出不切实际的过快的要求。即使进展慢一点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应该有一个进行设计的计划。由于我们对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对新经济体制进行设计缺乏经验，人才也比较缺乏，我们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从事这种设计的人员究竟需要具备一些怎样的知识，如果欠缺的话，如何尽快地补足。

当然任何设计还要经过审查，在工程设计中设计的人和审查的人是应该分开的。审查设计的人当然也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现在我国智力机构实在太弱了，必须大大加强这种

机构才能有效地进行这个工作。

关于制定实现改革的步骤。如果说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改革最后的结果——新经济体制画出蓝图，那么这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要把为了建立这个新经济体制而必须采取的一个一个的措施规定出一张时刻表。我们的目标明确地是要在我国实行全面而且是深刻的改革，不以实现某种局部性的改革为满足，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正严重地妨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等待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把新经济体制设计好之后再采取行动。这就要求从现在起，就开始改革的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同时，由于我国拥有九亿多人口，与国家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匈牙利不好相比，情况也复杂得多，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也困难得多。因此，必须先进行一些试验，先在一些地区进行一些局部性的改革，来取得全面改革所需要的经验。加上我国受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还要竭力避免在改革中可能发生的脱节等造成的损失，要求在采取每一个改革措施后都能对生产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步骤的问题就格外重要。如果步骤选择得适当，整个改革的进程就会顺利，就可以快一些。如果步骤选择得不当，改革就会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困难，甚至可能发生曲折，结果反而慢。

采取某一改革措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因此研究实施改革的步骤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仔细地去研究采取每一个改革措施所必要的条件。如果条件研究得不清楚，就很难把经济改革步骤安排得好。缺乏必要的条件而硬要去采取某一项改革措施，常常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在条件具备时如果不去

实施改革，那就会丧失时机。

经济形势是采取改革措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条件。例如，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对经济改革之间就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在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产业结构很不合理的情况下，全面地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不仅全面改革会受到调整的影响，就是有些单项改革也是如此。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况下，把国民经济调整好，较之实施改革是一个更为迫切的任务，它将为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为实行改革还要创造组织工作水平方面的条件，我们可以举物价的合理化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产品和原料燃料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企业的纯收入、“资金利润率”等，就只能反映企业自身经营水平的变化而不能反映不同行业经营水平的高低。因此利用这些经营手段来对企业的生产进行计划管理这种改革，也就受到不利的影晌。为了采取这样的改革措施，提高物价工作的水平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匈牙利就把建立一个组织得比较好的强有力的物价局，作为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当然要把物价工作做好又必须有组织得比较好的统计工作）。在我国目前物价很不合理而物价工作又组织得不好的情况下，采取上述改革措施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采取某一改革措施所需要的条件有的是在改革之外的，上面举的关于经济形势和组织工作的两个例子就是这样。但有时别的改革措施本身可以成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改革措施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发生改革措施哪个应该在先，哪个应该在后，哪些应该同时进行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应该看到采取某一改革措施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是很复杂的。例如当我们要采取用纯收入、“资金利润率”等作为对企业实行计划管理的手段时，物价是否合理是一个条件。但是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也可以作为采取这些经济手段的条件。即我们可以对产品价格偏低或成本价格偏高的行业，采用少征税和提供低息贷款这样的办法来使他的纯收入和“资金利润率”提高，而对产品价格偏高或成本价格偏低的行业，则可采取相反的办法。这就是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可以起互相补充的作用。于是“措施——条件”的问题就呈现更大的复杂性。

对实施改革步骤的研究，一是要分析我国的经济情况，并且要注视着经济情况的变化，一是要加深对经济运动规律性的认识，两者加在一起，可以看做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则是要总结改革过程中的经验。近年来我们采取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试验。这一措施证明是完全适当的。它起了推进生产的作用，也起了用实践来说服某些对改革有怀疑的人的作用。关于组织联合体的试验等，也是很有意义的。凡是属于试验性质的措施，就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总结经验时，研究采取某种措施需要何种条件的问题，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 经济是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提 要

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直到现在还不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所有制，而是在我国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由街道或县区办的国营经济。真正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还只是个别的，但有可能会发展起来。

城镇集体所有制是在一种得不到支持的困难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的盈亏与在这种经济组织中的职工的利益的关系比较密切，不象所谓“全民”所有制那样吃大锅饭。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技术装备，一般来说也比较低，便于吸收待业人员，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比较好的经济组织形式。

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在目前条件下，城镇集体所有制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的体制改革可以起到某种促进作用

* 这是作者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在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理论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用。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前途未必是向目前形成的国有制经济发展。我们不能排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两者都向另外一种高于它们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前进。

今天开幕的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理论讨论会，是进入八十年代我国召开的第一个大规模的理论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题目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很重要的。它涉及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城镇集体所有制问题，是我国的一个特殊问题。别的国家也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工业合作社、商业合作社等等，但是和我国现有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很不一样。

说历史，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早就有了。抗战期间延安有一个有名的“南区合作社”，在这个合作社里就有手工业生产。那时我在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工作，对这个合作社的情况是有些了解的。昨天我看了山西二轻局同志写的材料，还提到一九四〇年山西也有了这样的合作社。这些可以看作后来城镇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萌芽吧。解放以后，同志们讲了，已经有了好几代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一九五六年前实行个体手工业、个体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后建立起一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这是第一代。这一代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到一九五八年大部分都“升级”了。最初建立起来的这一代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合作社性质的，升级就变成了国营企业。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以家庭妇女

和社会上闲散劳动力为主又建立了一批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这是第二代。一九六六年《五七指示》以后，又办起一批“五七”工厂、“五七”生产组等等。它们也被认为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这是第三代。接着，在十年动乱期间，国营企业停产“闹革命”、“打派仗”、“武斗”，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可是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却发展起来了，显示了这种经济形式的特殊作用。这些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大多是街道办的，有的是区县办的。因为国营企业招工等有许多限制，人们对办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就很积极。从1965—1977年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这是一个不小的百分比，由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不断有升级的，如果把升级的也计算在内，这个百分比还要大些。一九七九年，为解决待业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又建立了新一代，即第四代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组、服务组等等。这一代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正在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对我国解放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情况，没有作什么专门的研究。对具体的历史过程的描绘和分析要靠在座的同志们来作了。后来几代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严格说来不能说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里没有什么合作社社员，也不开什么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他们和国有企业里的人一样也是拿工资的职工，实际上是街道工厂或区县办的工厂，在和国家的关系上与平常人们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是一样的，但是沿用了城镇集体所有制的名称。历史很长，一代又一代，情况和性质发生过许多变化，在外国似乎没有这样的一种复杂的过程。

对城镇集体所有制，中央并没有发过什么文件来号召和提倡。《五七指示》也没有讲到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形式。国家对城镇集体所有制也没有有意识地加以扶植。不但没有扶植，反而在原材料和燃料动力供应、产品销售、税收、工资福利等方面与国营经济相比困难都多得多。但是这些年来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得却一直很快。这说明在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有它特殊的历史，也说明城镇集体所有制有它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现状是：一九七八年底，工业、交通、商业、各种服务业集体所有制经济职工人数二千多万。它所拥有的固定资金和国营企业是不能相比的，差距很远；它的产值和国营企业来比，其比例也很小，但是职工人数和国营企业职工人数相比，所占比重却很大。工业、手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数到一九七八年底，有个材料上说有一千二百多万，相当于我国全部工业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城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数目也很大，一九七八年底大约有十万个，多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八万四千个这个数字。但是它们的企业规模小，拥有的装备便宜，有机构成低。

关于如何对待城镇集体所有制，有一系列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当前现实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估计？它有没有发展前途？这种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暂时性的在一个短时期内的现象，还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现象？它会向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形式前进？等等，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都没有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特别重视，领导机关也重视得很不够。因此问题也没

有着重提出，明确的回答也是没有的。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文件也一直迟迟没有提出来。人们对城镇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性质也就有许多糊涂看法，这不能不影响到城镇集体所有制的健康发展。

有一个看法，事实上是存在着的，那就是把城镇集体所有制看作资本主义性质。在文字上明白地这样来表述恐怕找不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看得很清楚的。比方说，在政策上，对待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办法是沿用一九五六年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比如税收政策上就是如此），也是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这样的例子你们比我熟悉，一定可以举出很多来。还有一种看法比这更加普遍，那就是把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看作是一种很低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看作是不得已而采用的办法，因此总希望很快地升级，从“小集体”升到“大集体”，再从“大集体”升到“全民”。这样一些看法究竟妥当不妥当？如果不妥当，正确的看法应该怎样，象这样的问题不搞清楚，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文件的确不好写。

这种情况的存在，当然不好责备我国的经济学界。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在无能为力的景况之中，那时谁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呢！而在“四人帮”粉碎之后，经济学界在研究发展规划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去年研究制定经济学科学规划的时候，我们议论要提出一百个现实的经济问题，引起全国经济学界注意，发动大家来研究，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是重视这个问题的。我国经济学界看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

为在现实生活中它的重要地位已经显露出来了。客观的情况是这样，人们就很自然地要问几个为什么和怎么样，以便确立我们对它的正确态度。这个问题已经列入经济学科的规划了，已经放到一百个问题之中，但是还没有等到经济学界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待业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有些地方就把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当作解决知青就业的重要途径，而且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于是很多同志对城镇集体所有制更加重视，很多同志认为，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并不只是解决知青就业的一时之计，而应该把它看作加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四化的一个战略性措施。对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你们这里的任仲夷同志也很关心。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关心和重视，对经济学界讨论这个问题起了鼓励的作用。于是经过一番准备，我们这个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理论讨论会就在这里举行了。

我们这次讨论会可以说是对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问题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开始，以前做有关这方面实际工作的同志当然不能不研究有关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问题。但是一般说来解决日常工作中问题的时候多，理论问题就顾不上多研究了，而经济学界则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次是关于讨论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问题的第一次讨论会。开过这次会，我想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会有很大的进步。当然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问题很复杂，开这么一次会还谈不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真正的研究应该在这个会议之后，但是为了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许多省市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收集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各抒己见，

互相启发思想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在这次会议之前，同志们做了许多的调查研究工作，写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城镇集体所有制问题是很有用的，今后应该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让这些材料发挥作用。

我们举行这次讨论会，不仅为了提高对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認識，以便更好地运用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来解决经济问题，而且要研究它对在我国现实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件事等三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了解。狭义的经济体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内部的具体的经济关系。这就是国家和企业（国营企业）、企业与职工、企业和企业以及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中央管理机关之间具体的经济关系。广义的经济体制指的是整个具体的生产关系包括整个所有制结构，即在我们考察的社会中，存在哪些所有制，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它们内部的经济关系如何。因此城镇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它的地位，它和其它各种经济的关系就属于广义的经济体制的概念之内。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去寻找最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并且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克服种种障碍。我们这次讨论会正是在我们寻找这种

最适合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时举行的。因此，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在这个新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其它经济之间的关系。

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未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前，它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事先设计出一种更能长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再加上人们主观上的原因，因此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的经济体制，长期不能充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今天，实行经济改革的条件基本上已经具备。

现在我们要为新经济体制进行设计，这就要研究我们所能收集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最能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根据。我们之所以说今天基本上具备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具备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理论从实践中来，也就是要从研究这些实践材料中来。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长期的历史和它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现状，就是这样的材料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有关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我国这样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没有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社会主义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不能取代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但是也可以看到在今天我国办得好的一些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有明显优越于未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有经济企业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工资并不由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确定，而

是同企业经营好坏挂钩，再加上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不是向国家上交利润，而是向国家交税（当然存在税率过高的问题），利润越多，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就越多，职工的收入也越多。不是赚钱赔钱一个样，因此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中领导人和一般职工的积极性就高（当然我是指办得好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说的，有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上级领导机关，不按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来办事，故意压低职工工资，或者抽走利润，那就不能不大大挫伤城镇集体所有制中职工的积极性）。一般来说，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官商的作风比较少。我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南京大学的一个同志告诉我的。说南京有一个国营饭馆，他们是一斤肉做十六个包子。旁边后来开了一个城镇集体所有制的饭馆，一斤肉做十三个包子。包子的质量也是国营的比集体的差。服务的态度，国营的大大不如集体。于是，国营企业的买卖被集体企业抢去了，一家很兴旺，一家很冷清。现在要实行奖金等制度，国营企业的经理就着急了。有一天经理带了人跑到合作饭馆去，说你们这样做是干什么？是不是要搞垮我们？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你们搞垮我们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去的时机选择不当，正是人家开饭的时候，他一番话，引起正在吃饭的顾客不满，他们不答应了，就起来责问他，批评这个国营饭店包子数量少、质量差和服务态度差的缺点，自动起来保卫集体所有制。结果国营企业的经理在群众责问下很狼狈地走了。这件事我没有调查过，最初有点不放心，怕传错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确实的，是《新华日报》上登过的。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北京天安门前照像的事情，这是

我从材料上看到的。由于集体所有制照像小组的发展，和国营照像馆竞争的结果，原来天安门的国营照像馆的服务态度有了改进。在集体所有制照像小组成立起来之前，国营照像馆的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半或二点上班，晚上五点半或六点下班，即按照办公时间八小时工作。照像的办法是一个人开票，一个人照。照时固定照像者站立的位置，背景是固定的，人相大小是固定的，人多的时候排长队，夏天就要被烈日晒，冬天就要被寒风吹，反正只有我这一家，又是吃大锅饭，用不着替顾客着想。知青组织起来的照像小组成立起来以后，一清早七点就来了，什么背景，什么姿势，人们可以选择，中午休息的时间有早有晚，这么一来国营照相馆的买卖就被抢去了，于是也就不得不改变服务时间和服务方式，工作有了较大的改进。从这些事情看来，恐怕是国营与集体经营的企业今天各有长处。现在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办得好的集体所有制对国营企业的整顿提高，可能会有某种促进作用。

我们一向说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领导的作用，这种说法现在从国营经济拥有的经济力量来说是对的。城镇集体所有制根本不能与国营经济相比。但是过去讲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还是从它的优越性来说的，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比其他社会主义经济是否优越并不是无条件的。办得不好的国营经济不如办得好的城镇集体经济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上面说的南京某饭店，只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而且国营经济普遍地存在一些重要的缺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真的要能起领导作用，必须对国营

经济进行整顿提高，进行改革，这是最为重要的保证。

我是这样想问题的。现在被称为城镇集体所有制的还不是真正的集体所有制，现在城镇集体所有制的这些优点，将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也可以具备。将来国有制企业也要讲自负盈亏，也要改上缴利润为税收，也要建立奖励基金等等。现在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体制改革有许多是向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学习，但是如果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真正的集体所有制，即由在这个企业中的职工成为这个企业的主人，自己决定生产也决定分配，那么它的优越性也许更显著。我看城镇集体所有制的这个发展前途还是存在的。当这一点实现之后，在我们国家里恐怕会出现国营与集体两种所有制长期并存的局面，将来很可能共同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所有制阶段。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确实有。我们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它可以不象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合作工厂那样，到处再产生，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我们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会到处再生产，而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做到这个，当然需要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在这个理论讨论会上研究一下。

谈 谈 小 经 济

提 要

小经济与大经济的区别指的是生产单位的规模，小经济可以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总有一些小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长期存在。忽视小经济的作用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

如果小经济小到一二个人的程度，也就可以称之为个体经济了。个体经济可以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后者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和生活的社会成员本人或者其家庭，所从事的与社会主义国营或集体所有制经济密切联系，并且接受指导的经济活动。它同非社会主义的个体经济应该有所区分。但即使走后者，在今天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也可以成为能在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助手。

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从经济上说，也是从根本上说，是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种满足不只是一时的，而是

既包括当前又包括长远的；并且不只是随便的一种满足，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满足，充分的满足。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是根本的，建设中其它的一切，都是从属于这个目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经常提出这个或那个方针，确定这个或那个原则。这个或那个方针、原则正确与否，主要看既定的各种条件下，按照这个方针、原则去办事，能不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把某种方针、原则当作是第一位的东西，而把本来的第一位的东西看成是从属的东西。这样，就常常事与愿违，出现了种种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结果。

这样的例子在以往二十年中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大规模的组织，一切小规模的组织（更不要说个体的了），消失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这似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唯一正确的方针和原则。似乎这样的方针、原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不允许人们提出与此相反的另外的方针和原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方针、原则是否正确，它需要用是否有利于达到上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就会看到，上述的原则与方针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要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还要有小经济。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骨干，它

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主导的作用。这当然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小经济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主义大经济的辅助，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我在这里用“大经济”、“小经济”，而不用“大生产”、“小生产”，这是因为“小生产”这个词，容易被人理解为小私有者的生产。我们所说的小经济，是指它的规模、职工数字在若干人以下的一个经济单位（例如三十或五十人以下——这个数目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带有任意性的）的经济活动被称之为小经济。这种小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暂时的存在，而是长期的。因为某些经济生活，甚至某些物质资料的生产，它的本性就要求小规模地进行。

前年南斯拉夫有位研究小经济的专家访问我国。他的经济科学的活动就是论证小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小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营方式和经济效果，等等。他非常关心我国经济界对他在中国讲学的反应。这样专门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对所研究的问题非常热心，他的这种精神是很令人钦佩的。可惜这个专家在去年的一次汽车事故中去世了。

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经济小到什么程度？是否有个极限？我想这个极限就是一个单个的人。某些经济活动，甚至某些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它的本性可能是适合单个人来进行的，那就应该允许它的存在。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可以和规模只有一个人的小经济密切结合起来，使这种最小的经济成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我在国外见过这种情形：在一个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家庭内，有一位妇女劳动力。她在家料理家务，但她还有多余的劳动能力。发挥她的劳动能力对整个社会有好处，也对她的家庭有好处。合作社考虑到这一点，于是组织她养肉鸡。鸡的数量是一万五千只，全部工作由这个妇女来承担。小鸡是合作社从国外引进的良种，鸡舍采用合作社标准的设计，由合作社提供材料建造的。鸡饲料也是合作社供应的。合作社向这位妇女传授养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包括防疫知识。小鸡长到六十五天，合作社负责到家里收购，送到合作社的禽类加工厂去。然后合作社又卖给这个妇女良种小鸡，开始第二个生产过程。这样的经济活动，应该说是单个的个人经济活动，但它又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的小经济我认为是应该允许的，而且应该承认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们的结论是：方针、原则是人们从实际出发，对实际生活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中得出来的。任何方针、原则都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要以能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为标准。我们不应本末颠倒，把本来是从属的东西看成本原的东西，而把本原的东西丢到一边不管。我想现在应该从认识论上来解决上面说到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只有一个。如果从哲学上、从认识论上对人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搞清楚了，就可以一通百通，就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扫除一个认识论上的障碍。

放宽经济政策是前进不是倒退*

提 要

对这个问题作肯定回答。主要的论点是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否优越，标准是看看当时当地条件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无条件地越“大”越“多”就越先进。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就要求多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并存。社会主义国有制、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社员的家庭副业与自留地经济各适合于不同的具体的经济条件，各有其最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同样属于社会主义国有制或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又有各种适合于不同的具体的经济条件的、最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并存，就是因为在不同条件下，某一种责任制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除了采用适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外，还有一个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占绝对优越的前提下，允许各种经济

* 这是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对《解放军报》记者孙浩刚、吕志勋同志的谈话，原为两位记者的报道，现改为文章形式，略作一点补充。

成分同时存在的问题。在这方面，主要是允许为满足人民物质的社会需要服务的非社会主义的个体经济存在和适当发展。

所谓放宽政策就是允许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最适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允许乃至鼓励在城市服务业、饮食业、手工业、乃至某些不带投机性的商业等方面适当发展的非社会主义的个体经济。

由于放宽政策是党主动采取的政策，是有领导地，是在党和国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加上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很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泛滥。

要回答放宽经济政策是前进还是倒退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做前进，什么叫做倒退。过去有一种糊涂观念，就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考虑生产关系，这就容易接受偏“左”的思想。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否优越，拿什么作标准呢？唯一的标准应该是看它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是，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总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衡量所有制的“先进”和“落后”，错误地认为无条件地越“大”越“公”就越“先进”，以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国家所有制无条件地比集体所有制优越，公社核算无条件地比大队核算优越，大队核算无条件地比生产队核算优越，不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无条件地比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优越，包产到大组无条件地比包产到小组优越，

包产到小组无条件地比包产到户优越，……请注意“无条件”三个字，就是说不管能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只要“大”，只要“公”，就一定是“优越”的。多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你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主观地把所有制搞得很“大”、很“公”，结果呢，生产力不是发展和前进，却是破坏和倒退。这种在极左思想下形成的固定观念，不仅过去很风行，就是现在也还有它的影响。当前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上出现的问题，就是这种固定的观念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我们党采取的正确政策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谁呢？是服从固定的、而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观念呢，还是服从实际情况，服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想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要知道，放宽经济政策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这是党中央根据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是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解放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的经济政策比较符合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因而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不断改善和提高。大跃进以后，“左”的思想影响了党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十年浩劫，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把我们的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放宽经济政策，是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也是检验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放宽经济政策是好还是不好，是前进的步骤，还是倒退的步骤，归根到底要看实践，看它的社会作用。放宽经济政策时间还不长，许多措施还在试验阶

它的生产方向和规模，国家都是要管的，它们是在社会主义指导下经营的，并不是放任自流。再次，放宽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泛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过去林彪、“四人帮”搞得很“左”，城镇个体经济基本上被扫荡光了，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不少地方资本主义反而泛滥得相当厉害。前些年温州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你越是搞得“左”，生产力就越是不发展，甚至遭到破坏，商品就越少，市场就越紧张，投机商也就有机可乘。这不是你主观上怎么想的问题，而是经济领域的客观规律。如果经济政策对头了，生产就会较快地发展，物资就会多起来，有人想搞投机倒把也难了。今年来各地集市贸易物价一直比较稳定，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把我们的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之上。从全社会、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叫社会主义。所以，放宽经济政策恰恰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因为它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都有好处。当然，放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出一点毛病，这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任何一项正确的政策，实行起来，总会有个别地方出点问题的。这个我们要给以注意，随时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只要我们做好工作，加强领导，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能不能建立这样的 社会主义计划体系？

提 要

要明确规定长期计划、中期计划与年度计划的不同性质。长期计划只是预测性的计划。做出具体安排是中期计划的任务。在中期计划中要有分年度的计划。年度计划只是中期计划中分年度计划，到年度将要开始时根据情况发展的具体化。作者设想长期计划应该是一本大部头的有事实、有数据、有理论、有分析、有切合实际的行动上的结论的科学著作，内容是根据本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根据现在可以预测到的世界和本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的理论及计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具体实际情况而确定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提出实现这样目标的途径，相应的方针政策措施。这样具有高度科学性的规划，对于鼓舞斗志，坚定实现四化的信心，以及启发大家去发现加快实现四化的条件和手段有重大意义。而有了这样的长期计划，中期计划才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应

该每隔一定的时期比如五年制定一个中期计划，即使采取滚动计划的办法，仍应该这么做，便于通盘考虑一下今后五年的发展。在中期计划中特别是年度计划中必须对各种平衡进行精确的计算，并落实到各部门和基层。

中期计划与年度计划分国家计划、企业计划、地方计划三级。由于中国是一个有九亿多人口的大国，应把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省直辖市的计划视作国家计划。企业计划指的是直属国家的大企业、大公司的计划。地方计划指的是县或相当于县一级的区、镇的计划。地方计划包括居民住宅建筑、城镇公共设施、中小学教育、医疗卫生设施以及小经济（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长期计划只做国家计划（包括中央，省、自治区和京津沪三市）。在制定省（自治区）的计划时，要了解省辖市和各县的资源的情况，研究制定长期计划中各县的发展。

文中强调了为保证制定计划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要做好“计划资料”工作，及时提供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研究者参考。为此要加强统计工作和改善现在的保密制度。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经济白皮书”，对我国的基本情况进行一次核实和综合整理工作是必要的。同时还应该对我国自然资源调查资料进行编纂的工作。为了提高经济效果，发挥各地区优势，为了使各省、市、自治区人民生活能够较快的改善，生产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必须加强各省、市、自治区间的经济关系，为此各省、市、自治区就要建立对外省外市经济的研究工作。

制定长期计划应该吸收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参加,这是保证计划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所必需的。要更进一步重视做好科学工作者建议的工作和发挥专家的咨询作用。

长期计划第一步是写出一个纲要,然后再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比较大的力量来编写上面所说的那部长远计划的科学著作。党和政府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在两年间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时间不多,需要特别抓紧。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具备了客观和主观的历史条件。即:(1)在客观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改变了私有制下经济当事人各从自己的私利出发的不可避免性,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消除了阶级的对抗;(2)在主观上,有了一个指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事业的领导中心,这个领导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因而能够掌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能够深入、全面地掌握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关于经济运动的科学知识,对未来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事先做出安排,使各项工作的进行有所遵循。

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打算讨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计划体系的问题。在这个题目下,我想讨论下面几个问题:

(一)从时间上说,计划应该分几种?是否可以分作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如果认为可以这样划分,理由是什么?这些计划在性质上应该有些怎样的不同?它们都应该包括一些怎样的内容?

(二)从计划体制上说,计划又应该分几种?是否可以分作国家计划、企业计划、地方计划?长期计划与中期计划、年度计划在计划体制上是否完全一样?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应该考虑哪些问题?根据哪些原则?

(三)各类计划应该由哪些人来做?要把长远计划编制好,需要哪些条件?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我们要怎样来做,才能保证计划的科学性?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制定计划中,应该怎样做才能起到他们应有的作用?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由于我们不能只顾国民经济的近期发展而对远景没有一个预测和设想,同时又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考虑,而应该尽可能具体和细致地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做出安排,因此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实践的经验同时编制长期计划(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不等),中期计划(三年、四年、五年、七年不等)和年度计划。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科学的。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凡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企业或事业单位对未来某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据,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和应采取的手段等做出论断并加以确认，都可以称之为计划。现在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工作计划，而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我们就要考虑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在温带地区（地球上大部分国家是这样的），农业的收获总的说来是一年一度的，前一年度的收获，就能作为下一年度生产的起点。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不论是重农主义者，或是亚当·斯密等，都是从年产品出发来考察社会再生产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时，也是以一年为期进行研究。因此，以年度为期来制定短期计划，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建立一个新厂，从开始施工到建成投产的时间，虽然因情况不同有很大差别，但是经验表明，把这个时间看成五年左右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此，中期计划定为三年到七年，特别是定为五年是适当的。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远景，当然要比五年更长，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可以考虑的期间。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对本世纪末的发展的预测和确立一个奋斗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们的计划分为以二十年为期（又可以更具体一些地把十年作为一个中间阶梯）的长期计划，以五年为期的中期计划，和以一年为期的短期计划是有科学根据的。

长期、中期、短期计划当然是就计划期间的长短而分的，但是这种时间的长短会对计划的性质发生影响。因此，一个国家的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在性质上就有所区别。

我认为应该明确长期计划是一种预测性的计划。这是因为在作为编制长远计划的根据中，不定的因素比较多，在比

较长的时期内许多情况会发生目前还难以预料的变化，所以不可能做到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具体的安排。编制长期计划就是根据某些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或即使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很大的材料（如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根据现在可以预测到的世界和本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本国与外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及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具体实际情况，来确定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提出实现这样目标的途径，即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而中期计划与年度计划就可以根据当前工农业生产的基础，即已经拥有的生产能力与已经安排的或即将安排的工程建设项目，可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比较具体的安排，它就不是预测性的，而是行动性的，而且成为分配人力物力的根据。

由于长期计划的这种性质，我认为在编制长期计划中要对所提出的目标、方针、政策、措施做出严格的科学论证。编写出来的长期计划，开头可以是一个简明扼要的纲要，但它的最后完成应该是一部有事实、有数据、有理论、有分析、有切合实际的行动上的结论的科学著作。即使是用简单扼要的文字，这部计划的篇幅，按照中国的方块字，我估计不会少于五十万字，希望在百万字以下。

我认为列宁指示要编的俄国电气化计划应该是我长期计划的一个榜样。在十月革命后，打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分子叛乱之后，在一九二〇年初，列宁就提

出要编制俄国电气化计划的工作。这个计划是列宁请三百多位专家在老布尔什维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主持下用两年多时间制定的。篇幅译成中文就有五十万字。今年，电力出版社把它译好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译文略去了八个经济区划中的六个，还有三十五万字。

我认为编制这样的长期计划是有重大作用的，它可以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一个奋斗目标，坚定他们实现四化的信心，为安排各项工作提供一个总体设想。列宁曾把他提议编制的俄国电气化计划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二个纲领。列宁这样做并不只是一种譬喻，因为我们说的“纲领”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并据此确定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各项基本政策及重大措施。作为每个党员必须承认的党纲（与列宁所说的第二个纲领相对而言，就是第一个纲领），就是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包括本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国家所处的世界环境，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等等做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的、理论的分析，指出党的路线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和基本方针。而这里我说的长期计划则是用它特殊的方式对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做出科学的分析和阐述，所以也带有纲领的性质。它对于第一个纲领来说，当然是带有局部性质的，但它涉及的既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范围是不小的，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是基础的部分。因此称之为第二个纲领是一种深刻的说法。

长期计划之所以可以起到上面所说的那样巨大的作用，靠的不是别的而是它的高度的科学性。如果没有这种科学性，

只凭主观愿望来讲一些“豪言壮语”是不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只有科学的预测，才能坚定人们的信心，鼓舞人们为之斗争的意志；只有科学的预测，才能对进一步具体制定中期计划起指导的作用。

长期计划不只是具有巨大的动员性，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是因为：如果长期计划是一部有实际有理论的科学著作，它就可以成为人们长期学习的材料。通过这种学习，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启发他们动脑筋、出主意，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向党向政府献计献策。我们知道，客观上是存在加快四化建设的条件，也可以找到运用这些客观条件来加快四化建设的手段。问题是这样的条件要大家去发现，这样的手段要求大家去琢磨。学习这部长期计划可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四个现代化的事业，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如果几亿人民不仅在生产和其他各种岗位上奋不顾身地劳动，而且以国家主人翁的身分关心如何更合理地进行工作，提出各种建议，我国的四化建设就一定进行得更好。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不同，它不是预测的计划，而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在计划期间的发展所做出的具体安排。物资和劳动在计划中都要进行平衡，各种物资的生产要能够互相衔接，生产与消费及投资要互相衔接，各项措施都应该落实。中期计划是在一定年限（通常为五年）必须完成的计划。时间的因素在计划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期计划应该有分年度的进度。在中期计划中，一个大国还应该考虑生产在地区上的分布及各地区的衔接。同时中期的计划

是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文件。尽管在有的国家采取不下达计划到企业的经济体制，但是这种中期计划是要求在工作中执行而且要求完满实现的。中期计划当然也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不应写成一部科学著作，因为它的科学根据，在长远计划中已经论述过了，而中期计划要求的是具体和落实。长期计划对于中期计划来说是带有指导性的，这一点上面我们已经说了。但在编制中期计划时，作为制定计划的根据明确了，因为时间短，不定因素就少了，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在计划期间哪些是可以做到和必须做的事情，哪些是可以努力争取的事情，哪些是做不到的事情。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各国的历史经验，五年为期是比较合适的。除了发生象战争这样的意外事件，五年制定一次计划应该作为制度确定下来。我也赞成制定滚动计划的办法，即譬如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五年的计划是一个中期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在一九八〇年制定出来，而到了一九八一年，就要着手补充一九八六年的计划，使一九八二年开始的时候仍有一个五个年的计划进度（即有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五个年的计划进度）在那里。依此推下去，到一九八四年就有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五个年的计划进度在那里。我认为，在一九八五年我们就应该在已经研究过的一九八六、八七、八八、八九四个年的计划进度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的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是同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的五年计划相接的。以上的滚动计划只是这个新的五年计划的准备。在采取了滚动计划的情况下，到一九八五年时编制这个新五年计划会成为比较容

易的事。编制新的五年计划会成为重新通盘考虑一下未来五年发展这样性质的一件事情。

中期计划既然包括每年的进度，在制定年度计划时要做的事情也就变成比较简单的事情了。年进度和年计划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年计划比中期计划中的年进度要更加具体。这样的年计划制定的要求，在年度计划实施前几个月根据上年度和本年度几个月中计划执行的情况对中期计划中这一年的进展进行补充和修改就可以了。罗马尼亚党中央每年召开的四次中央全会中，春季和秋季这两次专门讨论下年度的计划。在春季，第一次讨论下一年度计划的全会要根据上年度和本年度初计划执行情况，对下年度计划做第一次讨论。第二次讨论计划的全会要根据又一个半年的考验，对下年度计划做出最后决定。

我认为，这样形成制度的办法是很好的。

年度计划更用不着写出一部书，但是这个计划要有比中期计划更为详细的分部门的产品目录和增产指标，要对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的平衡有更细致的计算，解决各部门和各地区各企业和全国计划相衔接的问题，以便根据这个计划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

计划分几级？中央、地方、企业等在编制计划上怎样分工？对这个问题有实行这样的办法的：先制定一个中央一级的计划，然后从中央到县逐级制定自己的计划，一直到企业。

这样，越到下面，范围越窄，越具体，便也越不成形。下级计划是上级计划的具体而微。但计划的性质并没有变。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不那么理想。可以考虑整个计划分成三种：一是国家计划，即国民经济计划；二是企业计划；三是镇乡的建设计划与镇乡小经济计划。并且要考虑比较大的国家与比较小的国家做法上的区别。象匈牙利那样只有一千零几十万人口的国家，它的国家计划，可以设想就是中央计划。但是象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九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央和省、自治区及京沪津三大市的计划都应该属于国家计划的性质。地区一级的规模也不小，但在我国，它不是正式的一级。而省辖市的计划，似乎也应属于国家计划，它的规模恐怕比匈牙利小不了多少。如果那样做，国家计划内部就分几个级。这些计划都属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性质，而且我认为，就是在中央计划中，也应该分有省市的内容。我上面说的镇乡的建设计划与镇乡小经济计划是属于地方的。大企业和大公司将来会成立得越来越多，它们的计划就属于企业计划性质，直接与国家计划相衔接。在我国可以考虑县以及相当于县的区、镇的计划，它的内容包括居民住宅建筑，市镇公共设施，中小学教育，卫生保健事业和小经济（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这就是说，它的性质是属于面向当地居民和一些对国民经济带补充性质的经济，以及为企业等提供某些公共设施，而不是全面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些地方计划部分地已列入国民经济计划，部分地已列入企业计划，而这一部分计划与国家计划、企业计划直接衔接。在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中，这三类计划都要有。

至于长期计划，我认为只要有国家计划就可以了，而且省辖市的计划也可以考虑不要。在长期计划中可以去考虑中央、各级地方、企业的分工。在长期计划中应该把全国分成若干经济区，研究各个经济区建设的远景，考虑它们在全国的分工。在列宁提议制定的俄国电气化计划中就列入八个经济区的计划，而且占用很大篇幅。我想我们要制定的长期计划也应该如此。除此之外，我想还应包括特殊地区的开发计划，特殊部门的发展计划，特殊工程的建设计划（包括大自然改造计划）。这些是否作为独立部分，还是写到其他有关部分，这当然是次要的问题。这些特殊的问题，从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属于国家计划的。

（三）

接着，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编制计划是一项科学工作。

上面我已经讲过，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实行计划经济，需要一个主观条件，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当然其中首先是经济科学）的指导。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因此编制计划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工作，应该遵循做科学工作的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态来办事。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根本的一条是从事实出发。因此必须首先详细占有材料。对编制计划来说，当然也是如此。为了强调这个思想，我想使用“计划资料”，即为编制计划所必需的材料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我们编年度与中期计划需要

有充分的计划资料，而编长期计划更是如此。搜集各方面与计划有关、特别是有重要关系的资料，是着手编制长期计划的前提，否则，我们的计划不可能有较高的科学性。

为了获得这种计划资料，首先就要做好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统计工作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知道，而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统计工作尤其重要。列宁对这个问题说了许多话，讲得都是很中肯的。这项工作应该得到特别的加强。现在我国国家统计局只有一百六十人，实在太少了。一九七九年，匈牙利是一个只有一千零六十九万人口的国家，可是这个国家的中央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就有一千多人。在布达佩斯，就有专门出卖统计资料的书店。而且我们国家的统计工作有时还不能坚持只对数字的准确性负责。我国统计力量至少应该增加一个数量级，才能迅速完备地掌握各种数字。今天，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分析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所谓基本情况，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要有可靠准确的统计数字和科学的分析。这样的工作，对我国来说，是应该特别强调的。这是因为我们在基本情况的掌握上还存在着问题。关于自然资源，各部门、各地方在建国三十年中积累有大量材料，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调查，也很有必要加以综合编纂，而在这方面，过去做得是不够的。这样做，一是便于把资料集中起来，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我国自然资源的全貌，便于综合性地研究如何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我国自然资源问题；二是可以对已经调查来的材料进行核对，检查他们的可靠程度和究竟还遗漏些什么，以便做进一步的调查；三是便于组织力量去做自然资源的考察，避

免重复劳动，节约人力物力。中国科学院早已建立有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应该考虑如何加强这个机构的工作。

我认为，分析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应该有一个文字上的成果，建议中央做出决定编写第一部“经济白皮书”。在白皮书中可以考虑分下面几篇：1. 我国现有的经济实力；2. 我国的自然资源和进行建设的地理环境；3. 我国的人力资源和文化教育水平；4. 我国进行四化建设的国际条件；5. 从我国目前经济中的问题看四化建设的潜力；6. 依靠我国的经济实力，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挖掘潜力加速四化建设的手段。

现在地方做长期计划的工作刚刚在开始。地方计划这一工作的薄弱是目前制定长期计划中的一个弱点。地方作计划，需要详细占有本地区的材料，还要了解全国和各省市有关的情况，迫切需要中央提供计划资料和加强各省市之间的密切联系，及时交换资料。我希望计委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做好计划资料的供应工作。为了做到这一些，就要运用各方面的力量把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加强起来。国务院各部拥有很多人材，要使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日常的工作中摆脱出来，在一个时期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同时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力量也应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同时还要改善现行的保密制度，向省市和参加长期计划工作的同志及时供应充足的调查统计资料。国外绝大多数国家统计数字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在书店里出卖。我们即使不那么做，但决不应该保密到省市不能及时了解全国情况，许多统计资料连高级干部和研究人員也看不到的程度。

我主张加强各省市的经济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不但要对本省本市的经济情况做科学研究，而且要对全国和其他省市的经济情况做科学研究，改变现在地方的同志主要靠中央召开会议的办法来了解全国情况的办法。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各省市之间的联系一定要更加紧密起来。人们之间社会往来越来越宽、越来越密切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现在我国和外国经济往来越来越多，岂能在我国的省市之间反而比较疏远？现在世界上都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跨国公司，岂能在我国各省市之间反而不能搞联合？而要发展省市自己的地区优势，不加强省市之间的联系也是做不到的。各省市应该互为市场。为了加强各省市之间的联系，彼此了解其经济情况是必要的。而这就要各自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且互相支持。

计划工作既然是一种科学工作，在制定计划中就应该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发挥科学工作者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专家不仅从学科上说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而且既包括在科学研究机关或高等学校里工作的专业工作者，也包括在实际工作机构工作的对某一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有系统知识的专家。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远计划应该吸收科学家参加。制定长期计划涉及许多专门问题，涉及许多科学问题，需要各方面的专家、科学家参与意见。同时，既然要把长期计划写成一部科学著作，那就更需要科学工作者来从事写作和编纂。而且对他们的要求并不只是参加几次座谈会，发表几次一般性的议论，而是要求他们对规划涉及的专门科学问题做专门的研究，发表经过专门研究的意见。专

家在编制长远计划中是主要力量之一。列宁提出要搞的电气化计划就是请了许多专家来参加写的。现在我们也开始这么做了，这说明我们对各项建设工作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件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以前的计划工作的科学基础就不坚实，要总结以前计划工作的主要经验，这可以算做一条。科学工作者的知识和才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我们还要认识科学工作者服务于四化建设有两种方式，一是提供他们在科学上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和和技术上对工具、工艺等的创造发明；二是对国家四化建设提出有科学根据的建议，或为国家四化建设提供科学咨询。只有对科学工作者的作用有这样的全面的认识才能在计划工作中充分运用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作用。

当然在党和政府这样重视科学工作者的知识才能，重视科学工作者的建议和意见之后，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也就加重了，科学工作者也要认识到提出有科学根据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建议不是一件轻易能做到的事情，要求用严格的科学态度从事这项工作，而且为此要花时间下功夫。越是做了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做了科学分析的建议，越能对四化建设做出贡献。而且在提建议的时候，只从自然科学或技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不行的，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个自然科学家或者一个社会科学家如果对某一个问题的结论都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那就应该合在一起研究问题。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密切合作。而且科学工作者和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工作的同志也要一起研究问题，即还有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与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密切合作问题。总

之，这许多方面的同志的通力合作是制定好长远计划的一个重要条件。

编制长期计划的工作既然是一种科学工作，在科学工作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办法就应该采用。如：撰写科学论文，进行科学讨论，举行论文答辩，等等。一项纯学术的工作要这样做，做编制计划工作也可以这样做。比如某项巨大工程，在做出决策前，象一个学术工作那样提意向、指导思想，以至把总体方案等拿出来，进行论文答辩，充分进行讨论，把以后可能发生的问题都事先讨论一番，争论一番，这可以避免以后的被动局面。

我计算了一下，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例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只有可能拟定一个长远计划的纲要，经过一番努力，这个纲要可以做到有初步的科学基础。因为编制一个长期计划，即使只是先订出一个纲要，也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太短，这个纲要的科学基础的坚实程度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我在“科学基础”上加上“初步”两字。上面，我已经说过，我认为长期计划的编制工作只做到写出一个纲要是不能满足的。因此有必要在纲要制定之后，再用两年多的时间做长远计划的编写工作，撰写上面我说的那部科学著作。我认为写作这样一部著作，两年的时间并不是宽裕的。但是又不能再延长太多，二十年计划总不能计划二十年嘛！因此时间还要特别抓紧。在有了一个纲要之后，在制定长期计划的指导思想确定之后，在制定长期计划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解决之后，用两年的时间，集中比较大的力量，加强党对这个工作的领导，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是能做到的。这个时间同列宁提出要

编制的电气化计划，用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对计划编纂水平的要求，应该比那部计划高得多。同时，我们编纂长期计划的基础也好得多，用差不多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应该是可以的。问题是能否把这个工作很快地组织好，采取什么办法去编制。

制定计划的四种方法的统一

提 要

制定计划时可以同时采用“最终产品法”、“资源法”、“部门法”和“最优化法”四种方法。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在制定计划中应该把这四种方法很好地统一起来。这四种方法外国学者也议论过，但在概念上或者在内容上和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并不相同。

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应该从直接满足社会需要的最终产品出发，使计划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性，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最终产品法。最终产品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最终产品，包括：1. 个人生活消费品；2. 社会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和医疗保健等事业所需的物品；3. 社会管理、国防以及国内阶级斗争所需的物品；4. 出口产品。其中前两种是主要的基本的。采取最终产品法，要求计划中对于满足人民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有具体的规定，但不应过高地许下诺言，要实事求是，要讲艰苦创业的精神，计划中人民生活应该提高到什么

程度就规定到什么程度。不要怕计划中规定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少，增长速度太慢。只要把为什么只能提高到这个程度的道理对人民讲清楚，人民群众是会理解和谅解的。但是如果在计划中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就会使有些人误以为计划制定者不关心人民生活，他们是会不满意的。人民从包括有改善人民生活内容的计划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社会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有更大的干劲为社会也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实现计划。当然最终产品法决不是忽视生产资料的生产。没有中间产品，哪里来最终产品？最终产品法要求的只是从最终产品出发，由近及远地安排中间产品，谋求国民经济的平衡。

资源法，就是要从本国本地区自然资源和济资源来考虑计划。这是着眼于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和充分发挥本国资源的优点、避免本国资源的弱点。我国未被利用的土地资源很丰富，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应该把“开发”这个词儿叫得更响一些。但是也要考虑地下矿藏并不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而且我国按人口平均拥有的矿产资源并不很多，因此，在进行开发（包括与外国进行补偿贸易）时，要十分注意不要浪费、破坏这种资源。在开发资源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那种如水利资源那样能够永续利用的资源，也要注意那种能和保护资源甚至改善资源相结合的那种开发工作。人力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按照资源法去制定计划，就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多这个优势，不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农业生产中，都要多生产社会需要的或者能够换取外汇的劳动密集的产品。为了发挥人多这个优势，

我们要对劳动力作合理的调配，使缺少劳动力的工作有必要的劳动力。为此要做艰苦的组织工作和进行必要的训练。我国人口密度极不平衡，在地区间劳动力的合理调配也是应该进行的一件大事。劳动力调配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不论在政策上或是在组织上都有许多难题要在计划中解决。

部门法就是要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教育科学文化部门、服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它们的重要性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平衡发展的原则来制定计划。按照部门法来制定计划，目的是要使各部门各个行业都能各得其所，在各部门、各行业中的劳动者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国民经济各部门越分越细和许多部门有新的独立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应该获得进一步发展，不但在部门方面要在两大部类的基础上发展，并且要引入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这些部门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特定的时间它在平衡关系中是“短线”还是“长线”。比如燃料动力问题，在我国今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最优化法就是在制定计划时要作经济效果的分析 and 比较，即必须提出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最优的一个。标准是在全社会所消耗的劳动为既定的情况取得最多的最终产品和直接进入消费领域的

其它有用效果。在上述三种方法中，这种方法的精神都已经运用了。最终产品法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在可能的范围内取得最大限度的最终产品。采用资源法，就是以谋求最大的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的原则来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部门法要求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得其所、按比例地发展，也是以谋求最大经济效果为必要的条件。除此之外，最优化法要求在制订计划时，对作为计划内容的每一个具体措施、具体步骤、具体政策，都要进行用经济效果比较分析的办法择优的工作。择优只是一个原则，要进行这一工作需要有一套统计方法与计算经济效果的方法，而为了系统地建立这方面的工作，不失时机地对各种方案、措施、建议进行经济效果的分析，就要加强经济效果学（或称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

我认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应该同时采用下面四种方法，并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这四种方法是最终产品法、资源法、部门法、最优化法。

（一）

这里说的最终产品是：（一）个人消费品；（二）社会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及医疗、保健等事业所需要的物品；（三）社会管理、国防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需要的物品；（四）出口产品。前三种都是要进入消费领域的物品，第四种不论国外的用途如何，但是同前三种一样，都不再进入国内生产领

域，因而不再是中间产品了。在这四种最终产品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是主要的、基本的，在最终产品中它占居百分之八九十。这里说的在制定计划工作中的最终产品法，就是从这四种最终产品出发来计划整个社会产品的生产。最终产品法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或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目的有别于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因此采用最终产品法来制定计划，就可以使制定出来的计划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性，保证计划彻底的社会主义性质。

采用最终产品法来制定计划，首先就要研究社会消费需要的结构和数量，并对最终产品需求迫切性和重要性进行排队。根据这种需要并考虑现实的可能，确定在计划的期限内究竟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到怎样的程度，确定分年度生产最终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确定从最好的经济效果的观点出发应该进口的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数量。最终产品法要求对人民生活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作出具体的规定。这样做，可以使得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的结合有一个具体的蓝图。并因此可以使得每一个人知道，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展，自己的生活可以得到怎样的改善。这样的计划就有更大的动员作用。这样的计划，可以使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干劲为社会也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实现计划。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会使人民对这种计划的关心程度受到影响。但是计划中关于人民生活提高的指标，必须是有把握可以做到的，不应随便许下过高的诺言。这样做，到时候不能兑现，反而使

计划工作的威信受到损失。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实事求是，要讲艰苦创业的精神，人民生活应该提高到什么程度，计划中就规定到什么程度。不要怕计划中规定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少，增长速度慢，只要把为什么只能提高到这个程度的道理讲清楚，人民群众是会理解和谅解的。但是如果在计划中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就会使有一些人误以为计划的制定者不关心人民生活，他们会是不满意的。

采用最终产品法，当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生产资料（即中间产品）的生产。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没有中间产品何来最终产品？采用最终产品法，只是要求在制定计划时先确定应该达到的最终产品的指数，并对最终产品的重要性的迫切性进行排队，由此出发，由近（指离最终产品近）及远（指离最终产品远）地安排中间产品的生产，并且按照最终产品迫切性和重要性的排队，来确定中间产品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排队。

在计划中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应该很好地平衡和衔接，做到在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时，能够及时地得到充足的必要的生产资料。中间产品的生产从原则上当然应当立足于国内，但有些生产资料要等国内能够生产出来时间上来不及，或者不划算，进口比自己生产有利就应该考虑进口。

当然，在安排生产资料生产时，有可能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最终产品的生产不相衔接，如最终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不够，而有些生产资料却闲置在那里，造成大量积压，这种情况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应该努力避免。

不过这种中间产品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不平衡的情

况也很难绝对避免。例如建设一个生产资料的工厂，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从一个工厂的角度来看，不具有一定大的规模，生产某种生产资料的经济效果往往太小，还是要建立大厂才好，这样就会有大的投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发挥经济效益。这样就会有过多的中间产品停留在生产的过程中。这些都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但是如果在制定计划时采用最终产品法，这种不平衡与不衔接的情况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用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来安排生产，本来可以使得不平衡不衔接的情况减少很多，现在就会人为地扩大起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

(二)

这里说的资源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现，必须从本国的资源出发，根据本国资源的特点，发挥优点，避免缺点，本着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本国资源的方针来制定计划。全国是这样，各个地区、各个部门也是这样。

这里所说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也可以叫做土地资源。土地，包括地形、土壤、地上水和地下水、矿藏以至气候等等。土地既是农业生产的条件，又是取得燃料、原材料的来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土地资源上的差异是有极其重要作用的。经济资源包括人力和生产工具。它们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两个要素。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标志着社会的发达程度。而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人，不只是数量而且包括着他们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进一步说也就包括着这个社会的科学、教育和文化水平，也

标志着社会发达的程度。但是处于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它们的经济资源，又可能有差异。例如有的国家人口多，有的国家人口少，它们在人力资源上就很不相同。这对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针会产生很大的差异。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好坏，同是否充分利用了本国资源上的优点，避免本国资源上的弱点密切关联。因此，我们在制定计划时就要采用资源法。

我国资源的特点，一句话说，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不发达，有着丰富的正面和反面经验，在经济工作上存在着许多问题的大国。

从自然资源方面来看，由于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又处在气候适宜的温带和亚热带，不论地上或者地下资源都是很丰富的。而且我国开发迟，许多资源还沉睡在那里，同许多发达的国家相比，这也是我国的一大优点。缺点是目前我们对资源的勘探工作做得不够，勘探资源的水平也比较低，因此许多方面的资源状况还没有查明。只有对远景储量、理论储量的估算是不能作出计划的，必须要有比较准确的可开采的储量才行。而且这种“可开采”的储量不仅要在技术的可行性上作出论证，而且要从经济效果的角度作出论证。储量和每年开采量之间应该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因为要计算究竟能开采多少，就一定要查明足够数量的从技术上和从经济上都是可以在近期开采的储量。这样一分析，我国可开采的储量不能说多。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已查明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源，总的说来与世界上某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更称不上属于最丰富的

副渔。在能源方面，就要加紧寻找煤、油、气以及其他可燃矿物，根据资源状况作好经济的分析研究工作。

在经济资源方面，既然人力充足是我国的一个优点，而技术和装备的落后是我国的一个弱点，因此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发挥我国人力充足这个优势。在这一方面，首先要合理地调配劳力，把劳动力调配到迫切需要加强的工作岗位上去。现在有不少工作迫切需要有人去做。问题是要很好的组织和进行必要的训练。这样的事情应该在计划中解决。同时大家知道，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百人，总的说来在全世界人口密度是中等水平。不能笼统地说人多地少，问题是在地区上很不平衡，有些需要人的地方没有人，而有些地区人口密度十分高。因此在地区之间调配劳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要做到这一些不但要有很细致的、切实可行的计划，而且不论在政策上或是组织上都有许多难题要很好的解决。

同时由于劳动力比较多，就应该注重劳动密集的生产。不仅在工业生产方面要注意劳动密集的生产，在农业生产方面同样有这个问题。如果调配得当，劳动密集的生产发展起来，我们会发现我国劳动力并不是那么富裕的。现在有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把人口多单纯看做是一个困难和缺点而不注意发挥中国人多这个优势，一种是以为中国人多就可以浪费人力。

(三)

这里说的部门法，是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

的各个方面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它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平衡发展的原则来制定一个国家的计划。

所谓国民经济各部门，按照我们现在的习惯和传统，首先分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

农业细分就有农作物种植业（狭义的农业），林业（包括森林培育和采伐），畜牧业，渔业（包括捕捞和养殖）。副业的概念不论在科学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清楚的。有的国家把食品工业和农业合在一起，由一个农业和食品工业部管理。这是因为在发展农工联合企业之后，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往往是由一个企业来经营的。而在我们的国家不是那么做的。在我们的国家，除了农民的家庭副业之外，已经发展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社队企业。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是五花八门的，它们事实上又接近副业的地位。

轻工业细分种类很多。在我国，因为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有时就独立出来，单独地考虑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生产人们对于“衣”这一方面需要的产品。除纺织业之外，轻工业中还包括食品工业，日用品工业，文化用品工业，医药和保健用品工业，以及烟酒等嗜好品工业等。它们各自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对于食、用、以及文化、科学、教育和卫生保健的需要。轻工业部门主要生产生活资料，但生产生活资料的不只是轻工业部门，许多耐用消费品是在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同时轻工业部门也生产一部分生产资料。轻工业部门的性质，部分地是它生产生活资料，部分地是由于习惯和传统，由于便利决定的。

重工业，在今天我国包括采矿业（包括可燃矿物和其他矿物）、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加工业、建筑材料、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等等。由此可见重工业部门的说法更带有习惯和传统的性质。比较科学一些的分类法，是把采矿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建筑业从重工业中分出来作为独立的部门，许多国家就是这么做的。

农轻重不能全部概括国民经济各部门，因为象旅游业等生活服务部门（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生活服务部门由于在外国已经发达，它和其他接近的工业合在一起被称为第四产业）、环境保护部门（它也是近二十多年发展起来的重要部门）以及科学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医疗保健部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门，但是不能包括在农轻重之内。

所谓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即除了上述基本上属于生产的部门之外，还有各种流通的部门，如商业（包括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在我国商业部门中除进行商业本身的业务外，还经营对商业部门来说便利的生产工作）、物资分配部门、金融信贷部门等等。

在计划工作中采用部门法，就是要对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and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平衡发展的必要性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使它们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各得其所，使得属于各部门的各个组织和广大工作人员的理想性和创造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采取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原理，就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理。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的结果，国民经济各部门越分越细，社会再生产各方面联系

越来越密切，因此关于社会再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就必须有所发展。两大部类的划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但是只有这一些，对于在今天我们制定计划的工作来说，已经不够了。今天一方面需要补充不能归纳进两大部类的其他部门，一方面要引进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在再生产理论中不引进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基本建设与运输的作用就不能呈现出来。

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全面深刻系统的认识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范围内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发展的生长点之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一定要做各部门技术问题的专家，关于各部门的技术问题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各部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我们的党，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成为这一问题的权威。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这方面的理论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论述。

关于各部门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对于一般性质的讨论，例如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才能使社会拥有的强大机器设备运动起来，才能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工农产品；一定要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才能使分布在各个地点的生产产品及时地衔接起来，使各地居民及时地得到消费品的供应；一定要有先进的机械工业，才能不断地提高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等等。一是属于针对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讨论，那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短缺的方面，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会更强。如在今天，能源

与运输、科学与教育事业就是特别短缺的部门。在计划工作中，采用部门法，就是根据对各部门的地位、作用的想法，确定优先发展的部门，在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没有在部门的问题上确定发展重点和优先照顾，就不成其为计划。

(四)

这里说的最优化法，是在制定计划时不能只考虑一个方案，而是要考虑两个以上的方案并对它们的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在这些方案中选择其中的一种。

对各种不同的方法、措施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和分析，是经济工作中的一条根本原则。在考虑微观经济问题时要这样做，在考虑宏观经济时也要这样做。世界各国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都懂得讲求经济效果。在制定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中也要讲求经济效果，不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讲求的经济效果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讲求的经济效果有所不同。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经济效果不是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首先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的经济效果，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经济效果是从属于这种由全社会角度来看的经济效果的。什么是从全社会角度来看的经济效果呢？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应该是全社会劳动消耗和取得的最终产品和最终进到消费领域的有用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研究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时，就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理论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制定计划工作采用最优化法，其实在上述最终产品法、资源法与部门法中都已经运用了。采用最终产品法的目的就是

为了在消耗同样多的社会劳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取得最终产品。而采用资源法就是按照谋求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原则去考虑利用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问题。而旨在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的部门法，也正是为了谋求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而应该采取的方法。此外我还想再补充说明两点：

第一点，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作为这个计划基础的各个具体方针和措施，都必须首先进行经济效果比较和分析。所以最后拿出来供选择的计划方案中的每一个，我们可以假定都是已经贯彻了这个原则，对其中包括的具体方针措施已经进行过经济效果的比较。这是最优化法的第一步的要求。

第二点，即使在提出的每一个方案都已进行了经济效果的比较和分析，也还有一个在决定最后的计划时要对若干个计划作再一次经济效果的分析的必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制定起草总的计划草案时，指导思想是可以有差异的。各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在没有对不同方案再一次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时，有可能难以肯定哪一种指导思想更为正确（有时做了这种比较分析也还不能最后肯定，而要由实践的结果来检验）。同时作为不同方案基础的各种具体一些的方针、措施，如果不在整体上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有时也难以判断哪一种优越。

在制定计划时要进行经济效果的分析和比较，要求做到用同样多的社会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最终产品和各种进到消费领域的有用效果。这是理论原则，如何把这个原则具体化，涉及一系列统计方法和经济效果计算方法问题。为了系统地

建立这方面的工作，不失时机地对各种方案、措施、建议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和分析，使得在研究经济效果问题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和统一的计算标准。

采用最优化法，我们就要重视“经济效果学”（或称“技术经济学”）。我们讲“最优化法”，强调讲求经济效果，不只是强调经济效果一个观点，讲求经济效果是一门学问。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经济效果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问题，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要提高经济效果，必须对经济效果学——包括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普及工作。要建立专门研究经济效果的机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为了尽快地把这项工作作好，组织各种技术经济研究会的办法是可取的。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已成立了一年多，他们做了不少工作，许多省市和部门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有的省市部门正在筹备建立。要争取在几年内，在一千七百万干部中至少有五百万人懂得关于经济效果学的常识。

（五）

除这四种方法之外，还可能还有其他重要方法，不过我们在这里只说这些。

我认为，制定计划应该做到这四种方法的统一。把这四种方法彼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把这四种方法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也是不对的。这四种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最终产品法是明确计划的目的，保证计划的社会主义性质，不采用这种方法，其他方法也就失去了目的性。资源法是使计划有一个切实可靠的现实条件，不采用这种方法，计划就是空中楼阁，

更谈不到发扬本国资源的优点，使本国国民经济能够比较快地发展，人民生活能够比较快地增长。至于不采用部门法，不能使各部门各得其所，就会造成各部门的不平衡和脱节。最优化法的目的是对制定出来的计划通过经济效果的分析和评价做到是最优的。第一种最终产品法是根本的，后面三种是最终产品法必要的补充。

在这里，我认为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那就是四种计划方法的名称，国外学者在他们写的文章中都有所议论，但是他们讲的这四种方法，在概念上或者是在内容上和我们在这一里讲的并不相同。例如最终产品的概念，他们都把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产品看作是最最终产品，这样他们讲的最终产品就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下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所说的最终产品就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的最终需求成了完全相同的东西。又如在他们讲的资源法中，没有特别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这样的问题，他们讲的部门法，也不是对各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使各部门各得其所的问题。在最优化法中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的概念等等。但是，他们提出这些方法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计划方法是有启发的。而且在我们所讲的计划方法和他们讲的计划方法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有些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今天我们对外国关于计划方法与计划工作的实践了解还很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作更多的工作。不过我们也想指出，要改进我们的计划工作的方法，我们要做的最根本的事情还是要用更大的力量去研究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理论，研究我国三十年来计划工作

的实际，对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从中找到最合适的计划方法。

我对计划方法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开始，以上我讲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

计划管理与计划管理机构

提 要

我们既然重视计划管理机构的作用，就要对它进行分析。

它作为一个整体，既包括权力机构，也包括智力机构。关于前一类机构，我们的方针目前也还存在应该有而没有，或者有但还薄弱和没有足够权力的情况，这样的机构应该尽快把它建立起来。总的说来，目前的问题是机构庞大、臃肿，官僚主义严重，需要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后一种机构的任务是保证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机构的决策的科学性。在我国，这一类机构，总的说来是很薄弱的。我国工作中的许多失误在很大程度上同这类机构薄弱有关，同这些失误造成的损失相比，在这类机构上多花一些钱是最为经济的，在这上面不肯花钱是最为愚蠢的。在谈论政府机构精简时，不应不区分这两种机构而同样看待，即使对待权力机构也应针对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但总的说来，权力机构越庞大，官僚主义就越多。

我国计划机关应该有较大的改变。国家计划委员会似可考虑设立由一位主管计划工作的副总理主持

的，由国务院各功能部门、综合部门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这样的委员会行使计划机关的权力，可以去掉由计划工作机关来行使这种权力带来的弊害。在这个委员会之下，可以考虑设立计划局、预算局这类权力机构。在这个委员会之下，可以考虑设立统计局、经济情报局、预测局、地理局这类智力机构，或者设立一个小型机构，与设立在委员会之外的统计局、经济情报局、预测局、地理局取得密切联系，以便利用它们的成果。由于第一，编制到本世纪末的长期计划至少需要三年左右，并且要在长期计划编制出来之后，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这个计划的修改和补充；第二，编制长期计划这个工作应当吸收从事许多领域研究的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技术经济学家积极参加，不可能把这些专家调到计划管理机关中去；因此，在计划委员会下设立一个长期计划编制委员会是有必要的。

应该考虑整个计划管理机构的改造问题。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设置怎样的计划管理机构最为合理，需要研究我国的国情，也要对外国政府机构的设置进行比较研究。

不论在资本主义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存在对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对近代社会生活的管理问题，而在管理中都包括管理的主体（管理者）、管理的客体（管理对象）、管理活动（管理的内容与方法）。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理相比，又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一）管理的主体是劳动人民或劳动人民的代表，而劳动人民在社

会全体居民中占绝大多数；（二）管理的客体主要也是劳动人民，因此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主体是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或是资本家的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管理客体是受他们统治与剥削的劳动人民，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是社会上相互分离的两部分人。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主体和客体都是同一的劳动人民，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带有自治性质；（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首先是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许多基层组织和各级各部门的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构造组织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包括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管理部门对基层组织的管理，又包括各管理部门和基层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在整个管理系统中，就会有在一定的范围各有各的管理主体和客体，就会发生从一种角度来看是管理主体或管理客体的东西，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就是管理客体或管理主体；（四）管理活动的范围很广泛，既包括生产也包括分配、交换和消费，既包括经济又包括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五）整个管理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整个管理是有计划的管理。社会主义制度管理的这些特点，说的是一种理论的或抽象的情况，实际生活比这要复杂得多。

我们可以围绕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来描绘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活动。这就是说，首先要掌握实际情况并根据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制定计划，确定计划要达到的目标，完成计划的进度，并研究好保证完成这个计划所必须确定的各项政策、所必须采取的各种措施，并作出明确的决定，然后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来实施这个计划。由于在计划执行的过

程中会发生许多事先很难预计到（或者虽然能预计到，但事先不可能准确地作出判断）的事情，因此必须针对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发生的情况，修正原来的计划，或者采取新的措施来保证原来计划的实现。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又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还包括社会其他主要方面的进展。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是许多方面管理活动的一个总体。

计划管理工作的好坏，是有客观标准的。例如，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最后可以以能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的程度来衡量，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以某种产品生产的数量、质量、成本来衡量。对某一个企业的管理，可以用企业的若干经济指标来衡量。在企业具有较大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的纯收入和纯收入对企业所占有的资金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成为衡量企业计划管理好坏的一个主要的客观标准。对于这些，不打算在这篇文章来讨论。在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有关计划管理机构的问题。

在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主体，应该是劳动人民自身。这样的阶段还没有到来。但是，即使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已经是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劳动人民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也还总要依靠一个机构，而且必须依靠一个组织得很好、工作得很好、有效率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机构是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主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还不充分（或者说历史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向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过渡的过程中）的情况下，劳动人民对这种管理还只处于参加或参

预的阶段，这个管理机构本身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实行这种管理的主体。我们国家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

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实行管理的机构，作为一个整体，那就既包括权力机构又包括智力机构。前者是管理权力的体现者，而后者则是保证管理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科学性的体现者。

一国计划管理机构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在采用集中型的管理体制时，计划管理机构的权力就大。当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的确定，不是企业自己作出决定，而是由计划管理机关作出决定并作为指令下达给各企业时，情况就是如此。而在对这种集中型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例如，在废除了下达指令性的经济指标办法的情况下，计划管理机构的权力相对地就小得多。但不论权力大小，既然是计划管理机构，就总拥有一定的权力，即总带有权力机构的性质。

同时，不论计划管理机构的权力是大还是小，作为它的一部分的智力机构的作用，总是需要增强的。所谓对社会主义事业有计划的管理，就是社会主义管理的主体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它是人类历史上对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科学的最高成就），以及运用其他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管理。因此，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就要求掌握有关计划管理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并且学会善于运用它们。所以智力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必要的、也是本质的因素。计划管理机构拥有的知识力量越强，作为智力机构的计划管理机构越健全，它们工作的越好，这个计划管理机构就越能起它应起的积极作用。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有关国家实行计划管理的权力机构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一些应该有的权力机构目前还没有。如管理我国国土的权力机构就是一个应有而没有的机构，到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土地使用、土地征收、土地转移等的法律，当然也没有一个根据这个法律来管理国土的机构。也有的虽然有，但它缺乏应有的权力和力量。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上就是这样。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机构臃肿，分工不明，效率低下，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对这类机构，就要厉行精简，反对官僚主义。

我国智力机构的情况又如何呢？总的说来是非常薄弱的。我国工作中的许多失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同这类机构的薄弱有关的。同这些失误造成的损失相比，在这类智力机构上多花点钱是最为经济的。在这上面不肯花钱是最为愚蠢的。

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类情况：有一类虽有但是人员数量不足，特别是缺乏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统计机关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们知道，匈牙利 1979 年全国只有 1,069 万人口，而他们的中央统计局却有一千多人。这就是说，匈牙利一万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中央统计局工作。这个中央统计局组织得也很好，因此统计资料就很全，这为计划管理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数据，各行各业都可以很方便地从中央统计局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统计数字。而且在布达佩斯街上还有一个专门出卖统计书的书店，就是外国人只要你懂得匈牙利文，口袋里有一福林，就可以买到大量的资料。可是在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国家统计局被解散，代替这个局的只有一个十四人的组，现在重新恢复统计局的工作，目前还

只有一百多人。我们当然不必在与全国人口相比的相对数字上向匈牙利中央统计局的人数看齐，我们当然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并不要求能够随便到街上去买统计数字，但为了工作需要总是应该得到必要的统计资料，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关于国土经济研究的机构也可以说属于这一类。1980年8月，我到墨西哥访问了与国土经济研究有关的两个部，一个是有五万工作人员的“人口配置和公共工程部”，其中负责人口配置的副部长办公室就有一千五百人。因此，拿出来的人口配置材料很具体，决策时都有很详细的根据。还有一个足有一万五千工作人员的计划预算部，其中国家地理研究总局有两千五百人。他们把每一块土地经过航测、遥感，作出现状和规划的地图。我国政府部门就只有国家测绘总局，它的职责只是绘制地形、地势等图，国家在经济地理等方面对它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配合有关部门、有关地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中国科学院有自然综合考察委员会、地理研究所、遥感研究所等单位，加在一起人数也不算多，任务不那么明确，条件方面困难也不少。因此，关于我国的国土情况也很不明。据说贵州报上来的耕地面积比实际的少百分之七十几。还有一个省的土地搞来搞去少了五千平方公里，到哪里去了呢？找不到。全国的耕地面积报上来的比实际的可能要少百分之五十。对土地这样心中无数，缺乏研究，怎么能真正科学地搞建设？我们怎么能做出真正的科学性的规划。

还有一类可以说是我国根本没有的，如专门从事科学预测的机构，专门从事技术经济分析的机构，专门从事市场分

析的机构。

因此，我认为在对待国家机构的态度上，不能不区别权力机构和智力机构，不区别怎样的权力机构和怎样的智力机构，说精简就都实行精简，说允许扩大就都扩大。而首先要区别权力机构和智力机构，一般来说权力机构要精简，权力机构越臃肿，官僚主义就越多。而智力机构，总的说来，不仅不能精简，而且还要加强，有的要建立，要抓紧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提高这些机构的水平和工作效率。当然权力机构也不能一般而论讲精简，该建立还是要建立，但总的说来应该讲求精简。

在这里，我们应该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计划管理拥有的权力，一个是计划管理机构所起的作用。权力只是使计划起作用的一个因素，而且一个管理机构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大小，并不与它拥有的权力完全成正比例。一个管理机构所拥有的权力适度，才是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条件。另一个就是计划管理机构所拥有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本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计划管理直接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智力是使计划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上面已经说过一个管理机构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同它所拥有的智力完全成正比例的。

我想在这儿插进一段讲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主义比较完整的定义，还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给阿·霍洛波夫的信里讲的那几句话，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

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①这个定义是否尽善尽美，可以商榷。例如，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就未见得确切。但是在这个定义中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我认为没有疑义的。因此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科学，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内容是很丰富的。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文化、政治和其它社会方面。因为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社会主义部分以及其他经济科学部门做它的理论基础，还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理论做它的理论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是细致的和具体的。例如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国民经济各部门，文化、教育、科学各部门（它们在一定的意义下也可以看作国民经济的部门），政治的、法律的和和其他社会的各部门等等（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行各业），有属于各行各业的各种社会机构。对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

^① 参见《斯大林文选》第599页。

相互关系的研究，就属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之一。而这一方面内容的研究，对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题目“计划管理与计划管理机构”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计划管理机构就应该具备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中对获得的新知识、新经验进行科学总结。

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阶段，还没有采取对所有企业废除指令性指标的步骤。现在不但大部分生活资料，而且也已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当作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了，但还没有废除产品调拨的制度和“计划供应”的制度。因此，在今天我国计划管理机构的权力，应该说还是太大了一点。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不对原来的经济体制作必要的改变，就会妨碍我们的事业。但是这种改变只有一步一步地来。今天我们在考虑讨论现实的计划管理和计划管理机构问题的时候，还只能从这个现状出发。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就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得稍微远一些，因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改革，可以把改革后的情况作为背景来讨论问题。但是对于未来的事总是不可能讲得很具体的，越讲得具体就越带空想的成分，所以我只打算附带地说一些自己对改革后的一些看法，而主要地讲一讲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管理机构应该如何改进以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多更好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的问题。

我在这里说的计划管理机构当然不只包括象我们国家各

级计划委员会，各部门的计划局或计划处这一种从事编制国家计划、批准计划项目这样的结构，还应该包括制定为实现计划所必需的各项政策和法令的机构，还应该包括进行各种组织工作来实施计划的机构，还应该包括针对实施计划过程中发生的情况，随时采取措施来修改原来计划或保证原来计划的完成的机构等等。我在这里所说的计划管理，当然也就包括上述计划管理机构所要做的种种工作。这许多机构的总的目的虽然是一个，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长远和当前的利益，但是它们在完成这个目的中的功用与职能是各不相同的。对计划管理的各个方面、各种机构全面地进行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我只想以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批准计划项目的机构为例，讲几点如何改进计划管理机构以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计划的制定和计划项目的批准，都属于决策的性质。作出一切决策，都应该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即要有必要的足够的资料和有力的论证，为此就要有提供各种为作出决定所必要的资料和论证的专门机构。而且这些机构不只是提供原始性的资料，而且应该提出各种方案、计划。最理想的办法是专门机构能够就解决某一个问题的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计划，这种方案和计划是必须经过充分研究的，必须是经过多方面比较，必须是经过仔细的周密论证，必须在用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角度来衡量各个方案、计划的各方面的优点和缺点上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证的。有了这样的若干方案，决策者只要从全局出发作出最后的抉择就可以了。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觉得可以考虑在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下面设立统计局、经济情报局、预测局、地理局这样的智力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应该有一批能够给计划决策提供科学根据的专家，包括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经济专家、技术经济专家，他们是计划机关的参谋和顾问。同时在这类机构中应该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积累大量资料和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这类机构不便设立在计划机构之下时，计划委员会下也应该有一个与这类研究机构对应，专门与这类机构取得联系，便于从这类机构那里取得其研究成果，帮助制定计划与批准计划项目。

当然计划委员会下也要有权力机构，如可以考虑在象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下面设立计划局、预算局这样的权力机构。预算和计划是分不开的，而且预算和财政分开的作法外国的经验不少，我去过的墨西哥设有计划预算部，意大利则单设预算部。而决策应该由一个委员会来作出，这个委员会可以由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或综合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匈牙利在体制改革后设立的计划委员会就是由一位主管计划的副总理主持，由各职能部门部长参加（部门部不参加）组成的委员会，而以计划局作为它的办事机构。设立这个委员会可以避免专门的计划机关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而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由一切职能机构共同决定有关编制计划和批准计划项目事项。

另外我考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下面应该设立一个长远计划编制委员会，我认为应该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理由是：我们应该看清编制我国从今天到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建设长期计划，决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作到的事情。特别是目前，我

们对编制长期计划所需要的资料，还不是那么现成，还不是那么充分。许多工作甚至还要从头做起。在这种情况下要编制出一部有比较高一些科学水平的长期计划，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当然今天已经进入八十年代了，而编制长远计划的科学工作现在可以说还刚刚开始，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完成编制任务是没有可能的。我估计把这个计划编制出来（我说的不是写一个纲要或纲要方针，而是编写出一部一百万字的总的计划以及字数比一百万字不知道大多少倍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长期计划、若干个特殊地区、特殊部门的开发计划和特殊重大项目的建设计划），至少要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长期计划能够早一些编制出来，因为编制这样的长期计划的工作越早完成越好，而且我们说即使现在就特别抓紧进行这项工作，在时间上说也已经太迟了。但是这项工作又不应该为了快，而牺牲它的科学性，不能允许粗糙草率，因此只能要求及早抓，及早把力量组织起来，及早动手作调查和研究。

由于编制长期计划这一工作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因此就有建立一个专门机构的必要。何况即使长远计划编制出来以后，还要继续加以补充和修改发展。

我之所以不提应该设立长远计划局而提出要设立委员会的理由是，编制这个计划，要涉及的科学领域很多，从而必须依靠许多方面的专家。计划机关不可能把许多方面的专家吸收到自己的机关中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采取组织委员会的方式，通过若干方面的专家，去联系与自己专业相近的专家，把各种专业专家的力量组织到编制长

远计划的工作中来是最为合适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设想，还可以作其他设想，在如何改变国家计划机关这样的问题上，我认为也可以进行学术讨论，也可以提各种方案供决策者作出抉择。

除了计划机关外，对其他计划管理机构如何设置的问题，我认为也应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计划管理机构的改组是整个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同时我国政府计划管理机构的不合理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事，但是设立怎样的机构才真正合理，却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研究一般的计划管理的经验，二是要研究怎样才适合我国国情。墨西哥设有人口配置和公共工程部，我看是符合这个国家国情的。墨西哥是一个拥有将近二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人口也已经七千多万。墨西哥在经济地理方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它的沿岸平原地区很狭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是在海拔五百米以上。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人口集中在处于海拔二千米以上的高原的墨西哥城及高原上的其它城市和乡村。墨西哥城一个城区的人口就有一千四百万，而沿海平原人口密度总的来说是很稀少的。而墨西哥的资源如石油等则在沿海平原，因此每年有几亿吨的物资要从山下向海拔二千米的高原运输，只这一点就要耗费很多的燃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有一个人口配置的问题。而解决人口配置的方法就是发展沿海工商业，建设沿海城市，为此就要先搞公共工程，如三通一平（通公路、铁路，通电力、通讯，平整土地），搞好地下管道建设之类工作，因此他们就把人口配置和公共工程工作合在一个部里。为了

能解决我国计划管理机构如何合理配置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研究我国的国情，总结我们的经验，同时也应该对世界各国政府机构配置进行一番比较和研究。

关于计划管理与计划管理机构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上我只是就我感觉到的讲一点意见，这些意见当然是不成熟的，不知道能否起到一些参考或者启发思考的作用。

建立和发展国土经济学 研究工作

提 要

国土经济学是以一个国家的国土作为对象的经济科学。研究这门科学的目的是为从经济的角度利用、保护、开发一个国家的国土提供科学论据。为了在经济上对于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土有合乎科学的认识，我们就要研究国土经济学一般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国土状况作出科学的描绘和分析；从经济的角度对正确对待国土提出正确的原则；并对利用、开发、保护、治理国土资源提出措施和规划，提出国家从经济角度对国土的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和法律。

我国人口密度高，特别是每人占有的耕地很少，实行计划生育是完全必要的，但人口和土地是相对而言的，我国还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没有利用，应该把土地问题提高到与人口问题同样的高度，引起普遍注意。

国土经济的研究是在我国制定长期规划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保证编制好我国规划所必要的基本工作。

我建议在我国建立和开展国土经济学研究工作。

我们所说的国土经济学，它是以一个国家的国土作为对象的经济科学。国土或领土，就是受一国主权管辖的区域；广义包括一国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大陆架以及它们的下层和上空。这儿所说的管辖，从消极方面来说，就是在未经本国同意时，排除别的国家对本国国土的任何的侵犯。从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使这块国土发挥它的作用。国土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从经济的角度利用、保护、开发一个国家的国土提供科学论据。

谁都知道，任何一个人都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们有生存的空间，而人们进行生产也要有一个工作场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手段进行分析时指出：“除了那些会把劳动的作用传导到它的对象中去，从而依某种方式，作为活动的传导器发生作用的东西，广义地说，我们还可以把劳动过程进行中一般说来必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在劳动手段之内。这些东西不会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在这一类广义的劳动手段中，又要算到土地本身，因为它是劳动者立足的处所，是他的过程得以进行的工作场所。”^①国土，从经济上来说，是一国居民居住、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地方。它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条件。

同时，国土是一国物质和能的源泉。不但存在于这块土地上的、能够产生能的物质是如此，就是来自宇宙的物质和能（如太阳能）也要凭借这块国土来接受。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4—175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么几句话：“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着水）原来就会以食料，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于人类。”^①即那时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东西从事采集经济、打猎经济。因此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的食料库”。不作为原始食料库的土地，除了海洋渔业外，在现代社会中从满足社会需要来说，所占的比重已很小。但是土地作为人进行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料（包括能）的来源，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在人类生产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代替的。

物质财富是劳动的产物。但是，马克思一直不赞成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这样的说法。他在《资本论》中引证了威廉·配第关于财富的话：“劳动是它的父，土地是它的母。”^②离开了土地，劳动是不能有它的产品的。马克思说：“人在生产上只能和自然一道来进行工作”^③，对一个国家的居民来说，就是和自己国土上的自然界一道工作，从自己的国土取得“物质”。国土中拥有的物质丰富，就是这个国家进行生产的有利条件之一。

当然一国可以到公海去打鱼，可以到现在尚未归属于哪一国家的地方去生产。但这只能作为一种可能的补助手段。一国也可以设想到外国去利用外国的土地进行生产，但这要得到主权国家的允许。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料和燃料。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经

① 同上书第 172 页

②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4 页。

③ 同上。

济上、技术上具有某种优势。如果不具有这种优势，这个国家就不能靠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如此，那些主要依靠从外国进口原料和燃料的国家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缺少资源感到头痛的。

一个国家的土地资源的多少，当然是和它的陆地、领海和大陆架的面积成比例的。一个国家的面积大，作为落脚点的土地的容纳量也就大，作为太阳能接受器的土地受照射面也就大。一个国家国土的面积越大，他占有地球的体积也就越大，资源就越丰富。当然地球不是一个均匀体，它所含的物质是不均匀的，它的表面和下层有不均匀的分布。因此，同样土地面积的不同的国家的土地资源是不一样的。

国土的重要性，仿佛是用不着多说的。人们在经济上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土，并不都有合乎科学的认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国家中又有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属于各社会集团的个人。他们在对待自己这块国土的看法和作法，可能也是各式各样的。而各式各样的看法和作法就会影响实际，带来各式各样的后果。于是就发生一个判断对各式各样的看法和作法孰是孰非的问题。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特别是消灭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和地主的的社会里，客观上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标准来判断客观上的国土条件是优还是劣，判断主观上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定的措施是是还是非，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需要有一门专门的学问从经济方面去进行研究，也需要有一支专门的队伍去进行研究。因此就需要建立和发展国土经济学这样一门专门的学问。

这门科学包括研究有关国土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一般理论、一般方法，然而它是一门要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因此各国都要建立以自己国家的国土为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的科学。对于我国来说，就要以我们国家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包含我国的岛屿）、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以外的领海、和由大陆延伸出去的大陆架、以及以上土地的下层和上空为对象来建立这门经济科学。

我国国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研究既适用于世界各国、又适用于我们中国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精确表述；这门学问的理论基础；这门学问的性质以及有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这门学问的方法；这门学问的历史和文献；并对世界各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比较。

（二）对我国国土的状况，包括对天然的自然界的状况与长期历史上和近三十一年造成的国土现状作出科学的描绘和分析。

（三）对从经济的角度如何正确对待我国国土的原则和这些原则的科学基础进行研究。

（四）研究利用、开发、保护、治理我国国土资源的措施和规划，并提出意见。

（五）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研究政府管理国土的职责；研究国家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有关法律以及这些法律的内容；研究为了进行国土的管理和执行已经制定的法律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

在这里简单地对这五点再解释一下。

利用和开发就是要发挥国土这一方面的长处，所谓保护就是保护这种长处不使其丧失，所谓治理就是增加这种长处，改变短处。国土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的这种不可分离性，也是国土经济学一般理论和方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说到发挥一国国土的长处与避免短处的问题，就要有一个对国土经济研究整体性的问题。因为要对一块一块的国土进行它的长处和短处的研究，既要考察每一块国土本身，又要对一国国土作整个的考察，对国土的不同部分进行比较，研究对每一块国土最好的利用方法。比如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土，我们就要把土地分成宜耕地、宜牧地、宜林地。这些就不只是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分类，它把我们对土地的利用的要求也包括进去了。一块土地可以用来作耕地，也可以用来作牧地或林地，究竟是宜耕还是宜林、宜牧，不仅取决于它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性质，还取决于全国国土的比较和国家的经济需要。

总之，国土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它把许多学科包括在内，而又不等于这些学科，它和别的许多学科有交叉的地方。它与有的学科交叉多，与有的学科交叉少。既然各学科有它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因此也就不是把别的学科吞并在自己之内，而是合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二，关于我国国土状况的研究。

国土经济学既然是一门具体的科学，就要从具体的实际出发，研究具体的资料。在我国首先就是研究我们国家国土的现状。当然研究现状也要有历史的观点，因为这种现状已经不全是天然的自然界的现状了，而是人类历史长期的产物。

例如，今天中国西北有许多干旱山区，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我们的祖先长时期在这地方生活、生产和进行其它活动，结果使这个地方发生了许多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最穷的地方，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经是最起作用的地区。“黄帝”究竟籍贯在哪里，说不清楚了，但是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就是在那里起家，这是可以考证的。我们近三十年来国土的变化状况非常大，这个变化有积极的方面，如淮河、海河的治理，许多水库的建设，自然的面貌有很多好的变化；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对土地、资源、自然环境的破坏等。这种对各种状况的研究和分析，作为一门科学要求当然是严格的。一个地区有许多资料，对于资料本身的检查，弄准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目前我们对自己国土的了解是不够准确的。不久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曾经召集农林牧的主管部门和有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教授、研究人员举行两次座谈会，会上谈到土地资源的统计材料不准确的问题。他们说湖南省桃源县上报水田有一百零二万亩，实测是一百五十六万亩，现在承认比上报数字多百分之三十。在中国，山地面积向来是不准的，但水田的数目是相当准的，这在旧中国就这样。如果水田有百分之三十的虚头，那就决不是“测不准”的问题了。这涉及前若干年的要求各地区追求“过黄河”“跨长江”而又不讲求实事求是的浮夸作风。关于国土的基本的资料工作并不难作，但工作量很大，花钱不少。我们一定要去进行这种基本的测算工作，否则怎么能作出关于科学地利用开发国土的规划呢？

制图是国土经济学基本资料工作。这件工作要系统地进行。我们国家有人数不小的测绘队伍和从上到下的测绘机构，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基本上还处在什么问题紧迫，就接受有关单位的委托去进行测绘的阶段，缺乏全面地、系统地制作整套可供国土利用开发的地图的计划，各种有关地图是各部门自己去制作的，常常没有统一的要求，有详有略，比例尺有大有小，有重复也有短缺。我国还没有把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大的比例尺完成制图的期限。过去在科学规划中虽曾有过要求，由于十年动乱，加以没有很好的检查督促，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有重新部署的必要。

建国以来在有关国土经济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但是由于这件工作还是分散地由各部门、各单位自己去做，很多资料并没有编纂成书。这样既不便研究者使用也很容易散失。事实上在十年动乱时期已经散失了许多。现在有让各有关单位进行一次检查，编制一个统一目录的必要。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弄清楚我们已经有了些什么样的基本资料，缺少些什么样的资料，以便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建立和开展我国国土经济学的研究，第一步就要把已有的这类资料汇总起来，请各有关单位指定专人加以整理并制定一个编纂出版的计划。各有关部门保存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是必要的，但为了建立把国土作为整体进行国土经济学的研究，就需要把各方面的资料综合搞到一起，建立各方面齐全的国土经济的资料库，其中有好多房间是专门放有各式各样地图的地图库。编纂出版各种资料应该有统一的开本和版式，编制的地图也要有统一的比例尺。不论资料和地图都要成一

整套，有一个体系。地图学、图书馆学都要在国土经济学里面发挥它的作用。

当然关于我国国土状况的调查，不能停留在对基本资料的研究上，还要根据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专门收集、整理、分析有关国土的状况。例如我们要开发三江平原和海南岛，就应该有完整的关于这两块我国国土状况的资料。这方面现在我们当然是有的，但有的没有印出来，有关单位不便利用。对现有资料应该严格地检查究竟是否有重要的遗漏，是否有不准确的地方。没有全面和准确的资料，就不会有经得起检验的良好工作。

第三，对从经济角度上看如何正确对待国土的原则的研究。

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国土资源，取得自然界的协力，这应该是国土经济学的第一条原则。

所谓充分利用我们的国土资源，就是不要使我国国土资源浪费掉。国土资源有两类，一类是有限的资源，比如地下的某一种矿藏是有限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就是这样，因为这些矿藏是地球上有了生物之后才逐渐积累起来的，在没有生命的地质年代的地层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一类矿藏，开采出一点就少一点。还有一类矿藏如含铁元素的矿，这种矿的成因与上述石油、煤、天然气不同，它的含量极其丰富，但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有经济价值的矿藏也不是无限的，挖出一点也就少一点。我们要开发矿藏，让它们为四化做出贡献。开采矿藏不能说是浪费，而是必要的利用，但是开采得不合理，那就是浪费。对这类有限的资源，浪费不

得。中国现在占地下资源过去没有开发的便宜。因为没有开发，所以今天还多一点。如果开发多了，我们这个优势就不存在了。所以对矿产资源决不能浪费，一定要精打细算。还有一些资源是无限的，比如水利资源。你不用的话，滚滚长江、黄河，每年都要流掉这么多能源。这些资源不开发是一种浪费，应该优先考虑它们的开发。让土地荒着也是这种性质的浪费。比方说有一块土地什么也不种，光秃秃地什么植物也没有，这块土地上照样照耀着阳光，但是没有能把它吸收起来的绿色植物，这不是白白浪费是什么？或者在这样的土地上长着对吸收阳光效率极低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杂草，情况也差不多。用更高的要求，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研究国土资源问题，距离充分利用差得很远。还有一种资源，如果我们对它处置得当，资源越开发越多，这样的资源当然也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成过熟林（即成熟了的树木和过分成熟了的树木构成的林子）如果让它在山上长着，就象老头老太婆那样，不能再长了。应该锯下来，把树根挖掉，让它把空间和养料让位给青年林。这样森林每年的增长量就会比现在大。西德的树林基本上是人工林，每年生长量比我们的天然林要高。据说，西德现在每年每公顷林木增长量是五点五立米，我们只有一点八立米。有的资源就是越开发越多，有的资源开发不开发不变，有的资源是越开发越少，这种区别在讨论国土资源的利用时要注意。所谓充分利用就是要尽量使国土资源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这种利用必须是合理的。

关于国土经济的第二条原则，就是要保护国土资源不遭

受破坏。上面说到某些资源的有限性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不能避免的。保护资源并不是说怕这种资源减少就不去开发，而只是要求不容许浪费。事情的确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合理利用和开发，同样的有限资源可以给我们加倍或加几倍的利益，可供我们利用更长的时间，提供多得多的产品。否则就会使资源比较快的枯竭。至于本来是无限的资源，如果利用开发得不合理，也会使资源枯竭。森林资源就是这样的例子。利用开发得好，可以做到永续利用，而且越采伐越多。如果利用开采得极不合理，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性的后果：不但森林采伐光了，而且可能导致水土流失，气候变劣，水库淤积，良田变沙漠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应该指出：直到现在为止，国土资源破坏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我国广大地区生态平衡受到很大的威胁。科学工作者已经发出了长江有变成第二个黄河的危险的警告。在这儿我还可以举这样的几个例子：云南的森林覆盖率已由过去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四川由过去的百分之十九至百分之二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十三，内蒙伊克昭盟开垦了六百万亩耕地，沙化了一千万亩，还有一百三十万亩为流沙所吞没。黑龙江省开垦初期土壤有机质高达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现在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黄河中游的耕地水土流失面积高达百分之九十，长江流域也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年冲入江河的泥土量达五十亿吨，相当于六百万亩肥土。对水库的问题，有人估计，由于水土流失，青铜峡水库只使用五年，泥沙淤积已占水库库容量五点五亿方的百分之八十七，盐锅峡水库只使用四年，淤积泥沙已占水库库容二亿方的百分之六

十八。有人认为这种估计过于悲观。我也希望如此。但即使这种估计只有一半可靠，后果也是可怕的，辛辛苦苦修的水库很快就变成大瀑布，损失了建设投资，损失了建设的时间，损失了有利坝址！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从四个材料整理出来的资料表明：海南岛森林覆盖率由过去的百分之二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七，海南岛一个水库库区的森林覆盖率由百分之六十六下降到百分之十七。过去洪峰期为八至十天，现在缩短到只有三个小时。

我们要讲成绩，也要讲讲损失。我觉得应该估计一下总的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常常不是一次不是一年而是会延续许许多多年的事情。有的损失可以进行补救；有的损失则是难以甚至是无法补救的。如水库真的因为淤积而变成了瀑布，将来能有力量把淤积的土地挖出来恢复原来的坝址吗？因此这些问题应该提到更高的高度来考虑，否则子孙后代是会骂我们的。因此在利用开发国土资源时，对保护资源必须给以特别的注意。

关于国土经济问题的第三条原则是注意治理。按道理说，人工的环境要比天然的环境优越，因为人工环境是人有目的地设置的；而天然环境的形成，却是在没有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情况下发生作用的，它是不按照人的利益来形成的。因此对于国土资源在充分利用开发的同时，我们首先要做好保护工作，有可能的话，我们要用人工的方法对国土进行治理，使它对我们更为有利。

当然，从经济的高度来看，正确对待国土的原则决不止上面说的几条，本文不想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归纳出若干

条原则，归纳得好，归纳得全，把这些原则的科学的基础研究清楚，讲清楚，这是国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四，关于利用、开发、保护、治理我国国土的长远规划和措施的研究。

我们国家正在制定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我们科学工作者要积极参加这一宏伟规划的制定。我认为我们将来编制出来的二十年远景规划应该是一部科学著作，应该是一本五十万字到一百万字甚至一百万字以上的科学著作。我们先要一个纲要，但是只有一个纲要是不够的，要有详细的规划，要有一部有事实、有数据、有理论、有分析、有措施的这样一部书。在这部长远规划中要包括许多重要内容，利用、开发、保护、治理我国国土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制定国土利用、开发、保护、治理的计划，首先要求研究清楚这方面的潜力。这要以我们对我国国土的状况的研究为基础。举例来说，我们在制定规划时会遇到如何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这就要先弄清楚现有耕地面积产量。如果我们对土地产品总产量的多少是已知的，那么单位面积产量就是用耕地面积来除总产量得到的商数。假定耕地面积的实际数字比原来统计数字多百分之三十，那么实际单位面积产量就比原统计的单位面积产量少百分之二十三。如果按原来比较少的耕地面积来计算，那么就会得出结论说我国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很高。从这个判断出发就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说在目前我国技术与经济水平的条件下，这个单位面积产量就难以进一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现在弄清我

国耕地面积比原来统计的大得多，那么对这个问题就应该有新的认识。这样就可以根据可靠的先进的科学实验中得到的单位面积产量来考虑在规划期间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可能性。

在制定规划时应该肯定我国还有并不很难挖掘出来的国土资源的潜力。我们可以举人口相当稠密的河北易县为例。这个县共有土地二千五百四十五平方公里，居民人口四十五万七千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一百八十人。但是易县还有很大的土地潜力。据介绍该县川角大队在一九六四年未开始治理这个大队的山林前，只种三十亩水地，还常常因水源不足遭到干旱，粮食亩产量不到四百斤。全大队五百一十多人，一年要吃国家返销粮七、八万斤。经过十年的植树造林，水源增加了，现在种二百四十亩水浇地，水还有富余，可以支援邻近的大队，粮食亩产量增加到一千三百斤。大队不仅不吃返销粮，每年还上缴粮二万斤。这个大队在沟口还搞了一个七点五千瓦的小水电，一年有好几个月可以发电，平均水流量每秒达零点零二立方。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七九年下大雨的时候，县委到川角和没有治理过山林的邻近大队的沟口去检查。那两个大队沟口是浊水滚滚，而川角流的还是清水，而且水流不象那两个大队急。可见土地潜力是不小的。河北省易县，还有一个南款生产队，那里有比较多的荒山荒滩，靠近拒马河，现在正进行大规模的造林，据县委的同志告诉我，根据现在已经种下去的树木的数量，如按一棵树每年长一元钱计算，每个农民今后十年每年平均可以有一千元的收入，而且并没花多少劳动。这就等于

每人每年在银行有一千元的储蓄。我们很多地方的情况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应该对各地的国土资源，按照充分利用的原则，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冷静地考虑把国土潜力挖掘出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制定出一个令人鼓舞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基础上的长期规划。

现在我们强调发挥优势，也是研究利用开发国土规划的一个指导思想。在这一地区的人要和这个地区的自然一道工作，在另一地区的人要和另一个地区的自然一道工作，因此可以运用各地区的优势用比较少的劳动取得同样效果。国家与国家间有一个比较成本问题，地区和地区间也有个比较成本问题。李嘉图提出比较成本学说，这个学说与国际分工学说一起曾被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而现在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恰巧要讲究比较成本学说。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成本不同。如第一种产品在甲国成本高而在乙国则成本低，第二种产品在乙国成本高，在甲国成本低。如甲乙两国交换这两种产品，则对双方都有利。其实国内也有一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如种甘蔗，在珠江三角洲种甘蔗就比在广东北部种经济。北方有些地方如内蒙种小麦只能亩产百十斤，种甜菜亩产糖量一般可达二百斤。优势就在这里。

在制定长远规划中还有一个人口问题。在讨论制定有关国土利用规划时很自然地会讨论到人口问题。我们今天重视人口问题是非常对的。我们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一百人，和世界一百零三个国土在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地区)相比，我们排行第十三。按耕地计算，这个次序还要靠前。我国人口密度低于英国和西德，每人平均耕地也少于英国和德

国。在耕地中我国百分之六十是旱地。旱地中，低产田又占一半。从这个角度看，计划生育问题是重要的。但是人口和土地问题是相对而言的。我们还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没有利用。我认为应该把土地问题提高到和人口问题同样的高度，引起人们普遍注意。广东广西加在一起土地面积大于日本，人口才七千多万，我们为什么就搞得那么紧张呢？国土问题没有处理好是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许多地方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易县南款生产队每人可有一千元的存款，如果不要这点存款，金饭碗里不就是一粒米都没有吗？林业的确很重要，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最近说，要象当年搞水利那样来搞林业。搞水利搞林业都是对国土的治理，这两个方面以后还都要搞，这里就有一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有正确的规划的问题。而这正是国土经济学要注意研究的课题。因此从国土资源出发来研究规划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个不容推辞的任务。

只是有了可靠的措施，规划才是落实的。因此国土经济学不能只研究规划而不研究具体的措施。这种措施不但有关政策方面的，有大政方针性质的，还应该包括技术方面的。国土经济学在这个方面就是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研究，要一件事一件事地搞清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力量，提出适宜的措施，在适当的时候，下决心去办。所以国土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不仅要收集资料弄清情况，不仅要提出原则，还要具体研究规划和措施。

第五，国土管理问题的研究。

管理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我们政府的

一件大事。一直到现在，有些应该由政府管的事反而没有做，对国土的管理是其中一个。对于外国政府管理国土的情况，我没有作过什么调查，不过知道这样一些情况：意大利的西西里设有环境和国土整治部。日本设有国土厅。田中写过一部《列岛改造论》，它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国土经济学的书。朝鲜前几年通过了土地法，对土地的规划、利用、管理、征收都作了详细规定，听说随之就建立了国土规划局，是同计划局平列的。波兰设有土地及环境保护部。在墨西哥还成立了一个对全国国土进行研究的机构，过去也是直属总统府的，墨西哥对全部国土都进行测绘和调查，都有档案。上面说到那两次座谈会上，大家有个意见，认为我们应该设一个管理国土的政府机构，迅速纠正国土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对全国土地资源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查，搞清家底。同时制定一个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土地法，由上述管理国土的机关作为专门执法机构监督土地法的执行。在国外，国土管理和环境保护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据了解国际上至少已有三十二个国家有环境保护部门。而我们只有环保领导小组的一个办公室，应该扩大这个办公室的权力，能起前年通过并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执法机构的作用。

现在我国从事国土经济学研究的部门和机构实际上是很多的，这是因为这个问题上的联系面很广，很多机构都关心这个问题，都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都在思考如何解决与本部门、本单位直接有关国土问题的措施和政策。和国土经济问题关系最为直接的有农业、林业、水产、水利、地质、海洋、燃料动力、交通运输、测绘、环保等许多部门。计委、建

委、科委、经委、农委、能委都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农业部还设有土地利用局，从农业的角度专门研究土地问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委员会，还有地理研究所、遥感遥测研究所，过去做过很多工作。中国科学院还设有研究黄海、东海、南海的两个海洋研究所、沙漠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所等专门研究国土治理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等也对此问题有所研究。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如农科院、林科院也有有关的研究机构。农业方面还有专门研究农业区划的研究机构。地方上对这个问题也很注意。如广东就对珠江三角洲的治理和利用问题开展了工作，还调查了海岸线，海南岛的开发问题等等。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三次科研规划中，都把有关国土经济研究的项目列入重点项目。在我们国家的议事日程上，也经常列有有关国土经济的问题。在这方面，三十年来做了大量的调查，取得了大量资料，也获得了大量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应该说，对国土经济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然而，我们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国土经济学这个问题以后，人们还是觉得很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各部门各单位都还只是从本身的工作出发进行调查。一方面有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工作是重复的，多消耗了许多人力和物力。调查得来的很多的资料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各部门间也不能很好联系。国土问题本来带有综合性，不建立一个统一的学问，把各方面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就不能

研究出应有的结论。同时我们经济界在讨论各方面问题时，从来没有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现在提出来叫作“国土经济学”，实际是老问题，新提出。而新提出专门建立国土经济学这样一门学问，就把这方面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有所推动。

这些就是我们提出建立和开展国土经济学研究的根据和基础。既有必要，又有基础，那么我们就应该说这件事情大有前途。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我觉得第一，应该对这件事情很好地研究一下，把为了要建立和开展国土经济学研究的道理讲透，把如何才能做到这件事的基础、条件、步骤、方法等研究清楚，好向政府提出建议，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引起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材料准确，问题提得恰当，有好的可行的建议，政府和有关单位是会大力支持我们的。我还想，我们是不是先做准备，在今年开一个国土经济学方面的科学讨论会的预备会，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由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研究机构对国土经济学有过研究的同志，来讲讲这方面问题。通过这次讨论会，一方面把这个问题作一番初步研究，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科学根据更充分一些，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些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舆论，引起更多的人来重视这个问题。另外我们想在已有的有关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把国土经济学作为研究项目提出来。搞国土经济学研究同别的研究一样，要确定研究方向、研究重点，研究方法，要考虑如何着手进行这个工作。希望同志们考虑一下，将来再搞个研究规划，研究一下国土经济学在若干年内要达到什么样程

度。这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涉及的面很广，究竟这件事有谁来组织，怎么推动，我想要靠大家来办。我们希望各个部委都能给以支持。今年开始工作时，可以得到些经费。当然得到的不会很多，到明年如果准备好的话可以提出这方面的预算，争取能够得到必要的经费。我建议成立一个国土经济研究会来推动这个工作，并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写信去索取这方面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有了一个技术经济研究所，它愿意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个项目涉及好几个研究所，技术经济所当然要参加，其他研究机构、学校和各部门力量更强，希望都积极参加。我们不光务虚，也要务实，把这个工作落实下来。我讲的意见完全是个人的意见，并不成熟，同时我可能说了些外行话，欢迎同志们批评。

人力资源及其利用^①

提 要

人力资源在任何现实的生产中的发挥总是不充分的。目前已经存在的人力，就象自然资源那样，成为开发的对象。在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的量的规定性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数和素质，因此除劳动人数外，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都可以使人力资源数量上发生变化，于是人才资源在人力资源中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但人力资源的发挥取决于多种条件，所有制的性质、经济发达的程度、经济政策、投资、土地资源等等。

中国是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同利用开发人才资源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的土地资源来保证人口增长所必需的营养资料，同时土地资源也是人力资源发挥其作用的场所。在我们中国应充分发挥这两个方面的资源，并且善于把这两方面的资源结合起来。

^① 这是作者为参加一九八〇年七月国际经济协会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经济学家第六次世界大会所写的论文。

为了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特别丰富这个特点，在工业方面要注意发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在农业和其他方面也应注意这个问题。

（一）既然一切生产活动都是由人的活动引起和控制的过程，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便取决于人的作用的（不仅是当前的，也是历史上的）发挥。但是在任何现实的生产中，这种发挥总是不充分的，因此已经存在着的人力，就象自然资源那样，成为开发的对象。于是，“人力资源”的概念也就得以成立，并为经济学家所接受。

（二）在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为宝贵的。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持不同的社会观点的人，都可能接受这个观点。经济学家可以从不同的考虑出发去研究人力资源的意义，为寻求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和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事科学的探讨。

“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社会主义者的目的是使劳动者上升为社会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不再作为单纯的劳动力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主人。这样“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就是自我发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并不妨碍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人翁们和他们的利益来从事经济业务管理的机构的参谋和顾问）来客观地研究人的这种自我发挥作用的条件，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

和方案。他们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也要了解其他社会制度下“人力资源”利用和开发的情况、问题和经验，了解各国经济学家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理论上的与实践上的种种想法。就这方面问题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对于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也是有益的。不论是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或者是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在“人力资源”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和许多共同的语言。

(三)人力资源的量的规定性包括可以作为劳动力的人数和素质。这里说的素质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体力方面，也包括脑力方面，既包括文化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方面，也包括思想认识、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因素。在一定的国家的一定的时刻，人力资源的量是既定的，但它又是可以变化的。人口中的可以作为劳动力的人数的增减和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都是人力资源在量上发生变化的原因。

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一部分在人力资源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四)人力资源的情况各国是有差异的，而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差异更大。这是因为后者取决于多种条件，而各国的条件又各不相同。

人力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根本条件是劳动者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结合。这种结合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又取决于多种因素：

从简单劳动过程的立场来考察，一国的自然条件、一国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获得的生产能力，是决定劳动者

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结合的物质基础。同时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与劳动技能是否能与他们将要去结合的劳动手段相适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结合。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更表明，在一个时期内生产出来的用于国内的生产资料加上用其他产品从国外交换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品种与数量又决定这种结合进一步的变化。

应该提出，仅仅从简单劳动过程的立场来考察是不够的。一国的社会经济形式对上述结合起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对这种结合的影响不应有任何的忽视。很明显，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不是相同的人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必须得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允许才能进行生产，因而这种结合受到来自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障碍。而在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体劳动者那里，这个结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只受这种所有制的范围的狭窄性的限制。如果做到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全体劳动者就是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种来自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就不复存在。最后一种情况的完全实现虽然还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程，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这个结合来自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就大为减少。

除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外，一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包括劳动就业的政策），一国经济组织和管理工作的水平对上述结合也有显著的影响。

（五）一个劳动者即使已经有了生产工作的岗位，已经能够占有一定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但是劳动者与劳动手段、

劳动对象的结合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仍旧可以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说，把劳动者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完全没有结合与已经结合分做两类，上述结合与否的问题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就业问题。

由于上述这种结合是否得以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就业问题也就可以在当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发生，而不论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也不论这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程度如何。

不论对某一个国家或者对某一个劳动者的就业问题，都必须做具体的分析。用一种理由去说明就业问题的产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解决充分就业问题同样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经济学家针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就各种不同的有关就业问题的理论和方案进行比较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六)由于社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在全部产品中的比重增加得很快，同时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料的增加所受的限制也比较小，因此这一部分生产资料用来和劳动者结合以解决就业问题所起的作用，和其他途径相比，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而生产农业品所能吸收的劳动者的人数，不但相对地减少甚至绝对地也在减少。因此充分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主要靠工业的发展。

土地资源，对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有特殊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土地是一切生产的前提和条件，而且为维持人口生存所必需的营养成分只能是土地的生产物，一国土地面积的有限性是这一国家人口增长的一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人口与

人力资源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两者是互成正比的，土地面积的有限性因此也就成为限制人力资源增长的因素。但是如果一国能够通过对外贸易解决人口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这种限制就可以在实际上不起作用。

(七)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中国不仅有九亿六千万人口，而且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也在提高和普及的过程中。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特别丰富这个优势，是中国经济学家关心和正在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时中国经济学家也正在研究人口增长过快和青年就业问题。

(八) 同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土地资源来保证现有人口和人口增长所必需的营养资料。

中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一百人，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三十人的三倍多，在世界上拥有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以上的一百零二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密度中，中国占第十三位，应该说是偏高的。尤其因为在中国的国土上还有将近百分之十八的难以利用的沙漠、戈壁、高山、高寒荒漠（苔原）和永久积雪与冰川地带，如果这部分国土不计算在内，那末每平方公里可以利用的土地须容纳一百二十多人，偏高的程度还要提高。

但是中国的情况简单地用“人多地少”一句话来表达是不恰当的。中国是“人多耕地少”，中国的耕地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而且其中又有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旱地，从这个数字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这样强调计划生育的原因。同

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强调要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利用超过国土总面积一半的宜林宜牧的土地上，大大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用林业来改善水土保持状况、改善农业气候、改善农业土壤并用增加林业产品和畜牧产品的消费来减少对粮食的消费。

中国还有二十七万平方公里河流、湖泊、水库、池塘等水面，其中百分之六七十可以从事养殖。海水养殖面积虽然现在还只有五千平方公里，但有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的中国，这个面积有大为扩大的前途。

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被忽视的粮食以外的土地产品的生产，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既起吸收劳动力到劳动岗位上来的作用，又起保证劳动力及其家属必要生存资料的作用。

(九)研究适宜于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这个优势的产品结构，是中国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的另一方面的问题。除了前面说的发展林业、畜牧、渔业外，在农业方面还有一个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问题。

在工业方面如果我们把生产分做劳动密集型的和资金密集型两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明显地更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农业如此，工业更是如此。举工艺美术、服装、皮革皮毛制品、日用五金等几个行业为例，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所能结合的劳动力为重工业的八倍。社会产品结构的这种变化当然也就会反映在进出口产品结构上。中国经济学家也正在研究对外贸易和利用与开发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

(十)中国经济学家深信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于利用和

开发人力资源有它的优越性，但仍有必要进行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化，进一步提高组织工作的水平，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

关于建立和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提 要

教育对四化建设不是局部性的问题，它对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提倡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经济学这门科学，可以对教育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作出科学的阐述以及改正直到现在对这种作用缺乏认识的现象。同时还要研究充分发挥用于教育的经费的效用。

教育在中国已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不只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应该广泛地引起注意，一切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重视教育工作，对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一）最近报上开展了对教育工作的讨论。我认为这样的讨论对我国四化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了实现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许多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如果教育工作的发展跟不上，如果没有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人才，如果没有能普遍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要完成这

个伟大事业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是整个国家各项事业中的薄弱环节之一，发展教育事业存在的困难还很多，因此就如何发展教育事业问题开展讨论，由大家来发表意见，替国家出主意、想办法，提高对各种问题的认识，就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了。

对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现在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只有全社会都来办教育，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应有的发展。

何以我国的教育事业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呢？首先，因为教育对整个四化建设的重要性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它已经成为四化能否完成的关键之一。大家普遍关心四化，也就必定普遍关心教育事业，这是很自然的事。其次，全国每个家庭差不多都有正在受教育或者将要受教育的青少年，他们能否受教育、如何受教育，是家长和青少年自己迫切关心的事情。有的家庭本身没有这样的青少年，但是他们的亲友家庭中也总会有这样的人。特别是现在每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很多，而我们每年能够招收进大学的人数却很少，考大学就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从关心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庭以及关心自己的亲友出发，也就会关心教育问题。第三，现在党号召为了适应四化建设需要，我们的干部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现在干部中的许多人过去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对他们来说就有一个补课的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干部中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还缺乏，所以广大干部也很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能还有第四、第五方面

的原因。总之，现在我们国家需要受教育的人，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得多。而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之很不相适应，于是就发生到处谈论教育的现象。

因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需要，今年来各方面办教育的热情也很高。用各种形式来进行各式各样的教育活动，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多。我当然不是说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在今天决不能把教育只看作学校的事，只看作教育部门的事。要使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和四化的事业相适应，就要求广大群众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有更好的认识，要求全社会各方面工作的人都来重视教育问题，大家来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创造条件。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成为今天办教育的一个指导思想。

(二)使我国教育事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对许多有关的问题作科学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工作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科学研究是多方面的。正是出于这个基本的想法，我主张在对教育事业的各项科学研究中，应该增加一项，开展教育经济学的研究。

教育经济学这个名字，望文生义，就是讲的对教育当中的经济学问题的科学研究，也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教育，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教育经济学，既是经济学，又是教育学。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它是部门经济学，把教育看做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或者对国民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一种社会职能来研究的经济学。从教育学来看，教育经济学又属于教育学，是属于教育社会现象学的。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五月间我在复旦大

学作了一次关于教育经济学的讲演。那一天我曾着重分析了教育的劳动属于生产劳动，也分析了应从“经济效果学”角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教育经济学问题等。这里我不打算重复这些内容了，只想提出些新的补充。

我觉得要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一定要对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党的五中全会对教育工作的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解决我国的教育规划和教育体制问题，但是不能说我们的同志对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已经有了科学的认识。我们当然不是把教育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如果那样来看问题就不是科学的认识了。但是今天主要的问题不是夸大教育的作用，而是对教育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今天在一部分同志的头脑中，还存在着教育工作可以比较慢一点发展的思想。由于存在着这种思想，就会认为用不着千方百计地来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就会认为用不着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大家对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真正科学的认识，人们就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发展教育事业，也就会同意在教育事业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须知我们的人力和物力是分散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人们的认识提高了，大家都愿意拿出一些人力物力来，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而且还有社会的力量可以用在教育事业上面，例如不少家庭宁肯拿出点学费也不愿意子女失学。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求拿出更多的事实，讲出更多有说服力的道理，来普遍提高人们的认识。特别是由于教育工作不是立即见效的事，需要把道理讲

得更加充分一些，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前一个时候，有一些人见物不见人，以为只要把先进设备买进来，就可以进行现代化生产，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后来前进了一步，认为买先进设备不应该是主要的，要重视引进先进技术，但是只是这样来看问题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归根到底还是要有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才能掌握技术，开动现代化的机器。日本一位经济学界的友人对我们说，日本是在自己的科学技术人员能够很好地掌握技术的条件下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的，所以能收到很好的成效，否则，即使先进的技术设备引进来了，外国的技术人员在的时候机器运转得很正常，他们一走，就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他说苏联曾从日本引进一套石油化工装置，这套装置建成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即日本专家走了之后，设备运转不正常达六年之久。现代化生产中科学技术人员占很大的比例，而且是越来越大的比例，教育对生产起很大的作用，而且是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外，人们对人力投资、智力投资的作用讲得很多，而且事实已证明他们这么讲是很对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对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缺乏认识，那就太不应该了。

（三）我们要把这种道理讲得充分，就要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搜集国内外关于教育在国民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历史和现状的材料，然后作出判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一系列过程正是教育经济学要加以研究的。另外，这门学科还包括这样的内容：要使我国教育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研究用有限的教育经费培养出更多的人才的办法。我们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国家在教育上支出更多的教育事业经

费，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事实上也有困难。所以就要去想各种花钱少、办事多的办法。许多同志认为，解放后我们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办教育的方法当中，有许多是花钱多的办法，例如大学生一般都采取住校的办法，就不很经济。这种办法限制了招生的人数。我们应该研究实行部分学生走读的办法。关于走读的主张，我记得是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老师等在一九七七年首先提出来的。当时他们招考学生，学生考试成绩很好，可是限于学生宿舍的平方米，不能多招收。主持考试的老师觉得这样埋没人才实在十分可惜，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于是提出了部分学生走读的办法。这种办法当然是一种比较经济的办法，而且这种办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解放前许多学校就采用过，在国外至今还是这样做的。当然，这样做不是没有困难的：学生喜欢住校，学校也认为学生住校管理比较方便，从外地招来的学生不住校更是没有办法，市内交通拥挤，住房面积小无法安静地学习，市内图书馆事业落后，等等，还可以说出许多别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走读是必行的办法，这些困难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比如开设夜间图书馆，礼堂空在那儿可以装些灯作为自修场所等等。这是一个例子。在教育工作中这种用较少钱办较多事的路子是不不少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是新办法，有许多困难、麻烦就不敢、不愿去尝试，而是应该积极研究、探索、总结实践经验，找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当然，不经过研究，不经过试验就在很大范围内推广，造成工作上的被动是不好的。但是不去积极想办法，那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认为我国教育事业

需要很大的发展，举例来说，有的学科如经济学的在校的的大学生，不是成倍增长的问题，而是成十倍、成百倍增长的问题。如果只采取现在这些办法，那肯定是很难以四化建设相适应的。这些办学方法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属于教育经济学的。

（四）我再回答你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教育经济学”这门学科与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吗？

因为与教育有关的经济体制也要进行改革，这是属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的。现在我们实行一种一进大学就是铁饭碗，进不了大学就不知道是什么饭碗的办法，对于大学招生和广开学路很不利。实行这种办法，考大学就成为对一个人一生命运关系重大的一场真正的战斗。影响所及，快到高中毕业的学生，为了考上大学，就拚命作各种应试准备，从而损害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和身体健康；而电视大学、夜大学等等因为毕业后国家不负责分配工作，而得不到巩固。我想提出这样的问题：可否改变一下办法，国家只对一部分学业成绩优良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余的则与在电视大学、夜大学或其他相当的教育机构毕业取得文凭的毕业生一起，参加就业考试。而电视大学、夜大学等毕业生学业特别优秀的，也可以免试就业。如果采取这种办法，我认为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缓和高中毕业生考大学时的紧张心理状态，也有助于其他培养学生的办法的推广和巩固。属于这方面的还有学费、助学金，走读生的经济补助等问题，这些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因为涉及到人们切身物质利益，涉

及到国家的财政支出,也不是简单的可以轻易作出决定的,因而需要作仔细的科学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也是属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的。

由于经济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经济效益学、财政学、经济政策等许多学科,教育经济学的领域也很宽广。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会对我国教育事业发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就可以从多方面去看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必要性。上面我只是说了几个重要的方面,不是一切方面。究竟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在哪些方面服务于我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其本身就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项任务。

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

提 要

一九七八年来，我们重视了管理科学，但较多地重视了企业管理，如在学校里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注意派遣这方面的留学生等等。关于国民经济管理，虽然几年来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收到了重大效果，但是作为一门科学，重视得还不够。应该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科学，采取有力措施来开展这门科学的研究，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一九七八年初，我们强调提出要重视经济管理的时候，大家理解的经济管理，更多的是企业管理。这是因为当时提出问题的背景是：由于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国企业正常的管理受到严重的破坏，而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许多问题一时未能得到解决，企业管理必须加强和整顿。同时在我国企业管理原有的一套作法中，有一些方法是比较落后的，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大家认为不重视企业管理，不提倡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就不能顺利地发展。《经济管理》这个刊物就是在这样的认识状况中创办的。

两年来，我们在宣传必须改进企业管理方面，普及企业

管理科学知识方面，在企业中进行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实验和培养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不但创办了刊物，而且建立了关于经济管理的一些学术群众团体，在有的大学里成立了研究企业管理的研究所，不少学校里也重视开设企业管理的课程，有的高等学校设立了这方面的专业，对在职干部也办了许多学习班、研究班。从许多方面来看，在企业管理方面进步是很快的，成绩是显著的。

应该看到，我们中国有五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近七十万个生产大队，五百多万个生产队，我们中国有三十多万个工业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和“城市集体所有制”的），有一百多万个商业网点……。这些企业是我国的基层经济组织。企业管理工作做得好或者坏，就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工作好或者坏；我们对企业管理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过分重视的情况；因此目前必须进一步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在对企业管理的科学研究方面，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按照我国企业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依据我国长期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来利用国外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方法，形成适合中国需要的一套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大家知道，经济管理可以分做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两个方面。借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可以分做微观的经济管理和宏观的经济管理两个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这么多的企业，改进企业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也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任务也很繁重。不但对全国经济的管理属于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就是对一

个省，一个市，或者对省下面的一个专区，甚至一个县的管理，都属于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

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其实也是用不着多说的。整体的工作如果没有管好，局部的工作即使做得还可以，也是会导致很大的损失，何况整体的工作没有做好，局部的工作也没有法子做好。这个道理，我们一直是这样讲的。现代系统科学也是这样强调的。所以我们不但强调要把企业管理的工作做好，还要强调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特别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基础上的生产，它是以整个社会的利益、全社会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其出发点的。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管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有必要特别重视国民经济的管理，而且可以做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效的国民经济管理。

两年来，我们不但重视了企业管理，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也是给予很大的注意。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在这短短的两年中间，我们提出了多少个和国民经济管理有关的重要问题。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或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问题；提出了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包括工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问题；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利用保护和开发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问题；提出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问题；提出了能源平衡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地区优势问题；提出了不允许实行垄断，相互封锁，要保护竞争的问题；提出了允

许我国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支援不发达地区的问题；提出了逐渐缩小工农业剪刀差和各类产品比价的合理化问题，提出了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体系的问题；提出了教育和科学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问题；提出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民主化和制度化问题；提出了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几种方法和它们的相互结合问题；提出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重视对经济效果学评价的问题等等。每个问题又包括许多重要问题。如在改革经济体制问题中就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的界限促进联合的问题；改革财政和外贸体制的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些，我不想一一列举了。所有这些都是有关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认为及时地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正确地提出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取得科研成果，对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中许多重大方针性政策性问题的解决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对已经提出的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且更加具体化。同时继续思考还有哪些重大的有关国民经济管理的问题应该陆续提出来引起大家注意。

我觉得我们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与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工作相比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多，而对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知识，特别是更加具体一些的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比较少，培养国民经济科学专业干部的工作也做得比较少。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观察是否合乎实际。如果我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么我就觉得在今天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象重视企业

管理科学那样，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普及和教学工作。

我觉得产生这种现象是同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有关系的。因为国民经济管理涉及的范围比较宽，理论性也比较强，不象企业管理那样具体，宏观经济管理科学与微观经济管理科学本来各有其特点等等。但是我认为，我们仍有强调进一步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科学研究和宣传普及的必要。

在有关国民经济管理的各门科学中，应该提到第一位的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社会主义部分。它对国民经济管理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在这个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那就是现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同志，比以前更善于观察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生活，从中提出值得深思的许多问题，而不象以前那样严重地受到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比较空虚。但是，仅就国民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注意的范围似乎还要更广阔一些。

研究国民经济的管理，涉及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还要研究许多生产力经济学的问题，涉及以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经济为对象的部门经济学，涉及一般管理科学的问题，因为研究国民经济管理就要研究这些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研究国民经济管理还需要懂得许多有关的专业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某些技术知识。

如果从和国民经济管理有关的专业科学知识的研究、普及、教学等方面来看，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的。举例来说，现在还只有很少几个专门研究国民经济问题的研

究机构，还没有专门的刊物，专门的学术性的文章也不多，学校里也很少设立培养国民经济管理人才的专业。有的学校也开设了若干有关国民经济管理的课程，但教材内容因为研究工作做得不多，一般来说，比较陈旧。出国留学学生似乎也没有注意派遣学习这方面的。不是说这些工作根本没有做，而是没有象现在这样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在做这样工作的时候，就没有那样自觉和系统。

不妨举一个城市建设问题的例子。这是属于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内容。城市建设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在城市建设中，我们的缺点很显著。居民住宅、蔬菜供应、消费服务、市内交通电讯、水电热供应、地下管线、空气、水、垃圾和噪音的污染、环境卫生……问题非常之多。各个城市情况虽然不一样，但总有几个方面，城市居民意见很大。这些还都是一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说象城市绿化，城市居民的休息，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等，它们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象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建国三十年了，还没有能拿出一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来和全市居民见面，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这应该承认是我们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城市建设是一门学问。在外国市政府和它的所属各机构中工作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受过专门城市建设高等教育的专家。我想我们的城市建设工作做得不那么好，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同我们缺少对城市建设的科学知识应该说是有很大关系的。目前，在各城市中工作的干部中间，系统地学过城市建设科学知识的人恐怕是很少的。直到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在学校里有计划地培养城市建

设的专门人才。当然，在某些工学院中，有些专业也开设几门有关城市建设的工程技术课，但是似乎还很少开设涉及城市建设全面工程和经济问题的课程。我也没有听说在哪个学校已经编写出系统总结了我国三十年来城市建设经验和系统地研究国外城市建设经验后的教材。因此我们也就不能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大批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城市建设专门人才走到各城市的负责岗位上来。

至于对既要解决城市工作又要解决农村工作的一个县、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省或管辖大面积农村土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负责人员来说，他所需要的知识面，懂得的科学知识更要多得多。对于这类国民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就似乎更没有受到注意。

还可以举另一方面的工作为例，那就是为了做好国民经济管理工作，我们就要做好统计、国土研究、市场和经济技术情报等工作。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此要有为科学地制定各种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所必须掌握的各种“计划资料”。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体系中都应该有哪几类的计划，以及“计划资料”的概念，我在另外的文章中讲过，不在这里再去重复已经讲过的话。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计划资料应该是多方面的。而取得这样的计划资料就要有专门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就要有专门的人才，专门的机构。我想举下面三个方面为例：

（一）要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就要求掌握各种有关的统计数字。现在许多国家的这种统计主要是由国家统计机关负责提供的。当然在有的国家里，某些经济机关，如银

行也提供许多重要的统计数字。银行提供数字是因为它在掌握统计数字方面比较方便,而国家统计机关则可以通过法律,要求各有关方面负责送交统计数字。国家统计机关的这个特殊的权力,可以保证它及时得到为作出完全的统计所必要的数字。但是一个统计机关要能做好工作,就应该对国民经济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有专门的研究,应该拥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才,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处理各种数字,进行科学的分析。这个机关还应该善于根据现有材料对未来发展进行科学预测。

(二)要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就要求对本国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经济资源、经济条件等有确切的和详细的了解。例如有一个土地广阔而又复杂的大国,象我们中国那样,弄清国土的状况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由于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对我国国土的许多情况不清楚,例如耕地面积就不是准确的。这就要求对各种土地进行测绘。我们还要对全部国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情况作出科学的描述和分析,要对地下资源进行勘探和研究。要研究人口和生产力的地理分布。这种研究的任务不只是了解现状,而且要进行预测,并且应该研究正确利用开发国土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对每一块土地究竟适宜进行如何利用,即从对它作某种利用的角度来看,究竟能否取得有用效果,或能够取得经济效果的大小,就应该能够提供出必要的数字。进行这样的工作,需要各种有关国民经济管理专门的科学知识和大量专门的人才。

(三)要编制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就要做好市场调

查，掌握市场动态。这就是说要了解本国消费和生产的各种社会需要及其变动的状况，就要了解国际行情。要做好并不是容易的，因为要求对情况的了解既必须准确又必须及时，既要求详尽又要求抓住最重要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

要编制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就要及时掌握本国和外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这方面的资料既可以对当前的工作发生作用，又是考虑经济战略问题所必需。现在人们不仅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注意研究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和发展。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反映在国外对“未来学”等的重视上面。这又涉及到另外一方面的专业科学知识和另外一类专门人才。

市场研究和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研究所要了解的情况的内容虽然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收集情报和对情报进行研究的方面。

总之所有这类工作都要求专门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并且在事实上也都已经发展成为专门的科学和技术。受过这种专门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训练的人，才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上述当作例子来举的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为了取得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科学管理所必需的资料。对企业管理来说也需要这三方面的资料，但是因为企业涉及的范围比较窄，这种资料工作主要服务于国民经济管理。和这些工作有关的科学也属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

最近我访问了墨西哥联邦政府的计划预算部，了解到这个部设有“情报、统计和地理全国服务总协调处”，在这个总

协调处下设有国家统计局、国家国土研究总局和情报研究机构。这个总协调处的工作范围正好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三项。我认为墨西哥联邦政府在计划预算部设立这三方面的服务机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三方面的材料都是为编制计划、确定预算所必需的基本资料。

附带讲一个问题。上面提到的墨西哥计划预算部国家国土研究总局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个机构现有人员是二千五百人。它的任务是编制全国五十万分之一的各类地图。它们编出的地图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我们参观了这个局的制图车间和电子设备，知道他们主要是靠航空和卫星照片进行测量和利用遥感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办法来对国土进行广泛的研究。我们在墨西哥还访问了联邦政府人口配置和公共工程部的人口配置副部长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一千五百人。他们利用全国国土研究总局所提供的地图，研究人口配置、城市建设、全国交通运输、水利设施等方案。这样的方案的研究在作出决定后又通过这个部的另外一个公共工程的部分去组织实施。从墨西哥联邦政府的这两个机构，以及我们过去了解到的，一个具有一千零六十万人口（一九七九年统计数字）的匈牙利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工作人员的中央统计局这个事实，使我想到了，我们应该区分两类政府机关，一类是权力机关，还有一类就是这种保证我们国民经济管理具有高度科学性的机关。前面一类机关人员应该紧缩，人过多官僚主义就更多。后一类机关在我们国家，问题是有的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有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很不健全。所以还要通过大力培养专业人才的方法来建立这类机关的工作。

我认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工作应该由这样三方面的工作来组成：一是作出决策，二是组织实施，三是评价或检查。这三个部分是互相衔接、结成一体的。同时，实施评价工作又可以是对已决策的事项进行某种修改和对新的决策提供所依据的资料。

在作出决策方面又分做两部分，一是为决策作准备：那就是由专门机构（由各类专家组成的专门的机关或委员会）提出若干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这是决策的基础。这个基础必须是扎实的，即必须是掌握为提出方案所必须的全部资料；并经过周到的研究提出来的。提出方案的人应该对所提出的方案作出简明扼要但是深刻的说明。二是由决策者在专门机构所提出的几个方案中作出最后的抉择。不能要求决策者本人对所决定的问题也是专家，但他必须具有更宽广、更远大的眼光，更加了解本国甚至世界的全局，更加了解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所在，和具有善于选择最优方案的经验和能力。在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即对一切可能的方案都提了出来的情况下，决策者基本上可以不必对某个方案以专家身分提出意见。

组织实施是一个极为复杂和细致的工作。要有一整套有效的工作机构、工作方法和行动步骤。在这个工作中主要是要认真贯彻已作出的决策。一个好的决策应该对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作了科学的预测，而且预先确定针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将采取的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可能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和问题，需要作出新的补充和决定。

国民经济的管理不能不对实施的结果进行考察，这就是

评价工作。进行这种评价工作的作用，一方面是检查已决定事项是否得到了贯彻，另一方面是检查原先的决策是否正确。

这三部分的工作，要求有关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与之相适应。关于前一部分，前面所讲已经涉及到了。第二部分的问题很复杂，如何有效地组织，如何组织才最有效，这个问题近年来人们讨论的也很多，已发展出一些有关的管理科学部门。还有第三部分也应该有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提出要研究与这三个部分相应的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只好留待他日了。

编 后 记

近几个月来,我陆续写了十几篇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编制长期计划、国民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对我国的经济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并提出一些有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这些意见和观点当然并不是很成熟的,也未见得中肯。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同志们对所涉及的问题的注意,抛砖引玉。在这十几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大都印出若干份分送给一些同志请他们指正。好几位同志看过后认为它们还有一些参考价值,主张把它们印成书给更多的人看看。于是我就把它们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集子。

这本书编排的次序是: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五篇,算做一组,放在最前面。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我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用的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那就是一个国家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和包括非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问题也包括在内了。

接着是关于计划体系、方法和管理机构的三篇文章,关于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三篇文章。这六篇文章可以算做两组,也可以看做有关我国计划工作的一组。

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是《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它的主旨从题目就可以看清楚，用不着再多说了。

为了给工作忙的同志提供方便，也为了使准备看全文的同志便于了解我写那篇文章的主要的想法，每篇文章只要稍为长一点的都写了提要，放在正文的前面。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